

生物进化和市场经济的运动还有一个相似点：均衡对它们都没有意义。^①变化是持续的，生存和繁衍的动力与环境提供的机遇之间存在差距，从而迫使做出改变。不过，我们这里需要暂停一下这个类比。

达尔文曾受到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思想的深刻影响（Coutts, 2010; Jones, 1989）。^② 在达尔文看来，生物体要实现繁衍，但支撑它们的物质资源的供应有限。资源量是停滞的，增长速度慢于生物体的共同需要。这会加剧竞争，从而出现不断的变异和进化。用我的词汇来说，大自然在经历这千百万年的进化之后形成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短缺经济体，没有中央计委、食品分配机构、警察或克格勃，每个个体都在为自己奋斗，争取尽量多的资源。^③ 用标准的术语来描述，这是一个过度需求的经济体，自然资源的供给不足。

本文研究的市场经济的状态正好相反，它是个过剩经济体，而非短缺。重点在于供给方面。但是，两种重要的作用过程依然在推动进化，那就是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关系。

我不是建议机械地套用进化论里的某个模型，而是借鉴其思想。经济学应该从达尔文理论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中汲取灵感。马克思和熊彼特两人都是达尔文的崇拜者，他们通过达尔文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我正在本文中努力追随他们的脚步。

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启发而产生的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已经有几十年历史，在早期的开创性研究（Veblen, 1898; Nelson 和 Winter, 1982）后有了重大发展，已成长为一个学派，与主流经济学的关系若即若离。^④ 我感觉自己和他们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希望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者们能继续完善理论、发展数学模型、拓展实证分析的基础。

不对称性

对于市场及其对生产和消费、出售与购买的协调机制，标准的经济学看到双方的对称性，而我看到的却是不对称性。与我有同感的人并不少。有许多术语用来描述这种现象，表7中列出了其中最常用的一些。

在第一对术语中，前一个词汇（短缺经济）被广泛使用，本文则是在介绍后一个词汇（过剩经济）。第二对和第三对词汇目前尤其受到凯恩斯和卡尔多的追随者以及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青睐。第四对词汇不属于理论经济学，而是商业领域的用法。第五对词汇，我曾经在自己的《反均衡》一书中做过介绍，但并未被广泛采用。

表7 协调机制的两个方面——对术语的总结

术语	关注的机制特点
----	---------

短缺经济	购买/生产和销售的愿望能否实现 短缺现象/过剩现象占据主导地位
过剩经济	阻止生产扩张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
限制需求经济	在宏观层面：哪个总变量处于“过剩方”？ 在微观层面：哪一方出现得更经常、更激烈？
限制过剩经济	哪一方在市场上居于优势地位？

这是指市场参与者的努力：

是卖方在努力向买方推销产品？
还是买方在努力争取产品？

^①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长期进化是延续数百万年变化过程。其他问题是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视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通常是指对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更短时期内的变化。多种生物体共生的某些系统可以用均衡分析的理论来描述，例如，森林中的动物群体形成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共生关系。如果人为干预消灭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自然的平衡都会被打破。捕食者会因为没有猎物而消亡，被捕食者则会因为天敌的消失而过度繁衍（这种情况可以用Lotka-Volterra模型来描述，该模型也能用于分析经济现象）。

^② 感谢Andras Simonovits提醒我，学说史上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事实。
^③ 我在早期的著作中曾介绍过此类机制（aggressive coordination）。
^④ 参见Hodson (1993)。

哪一对词汇最后将被广泛采用，或者说会出现新的词汇，这并不重要。这对词汇所反映的其实是同样的观点：供给过程和需求过程这两个方面存在持续的本质的差异，一方短缺，另一方过剩；一方更强，另一方更弱；一方对另

一方占有优势等。我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市场的持续的不对称状态。^①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非均衡”（disequilibrium）模型的发明者有共鸣（Portes 和 Winter, 1980; Benassy, 1982; Malinvaud, 1977）。在某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上我们存在分歧（如数据加总等），但我们都特别关注在某个方向上偏离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状态。

我也赞同那些主张“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学者的观点（Layard、Nickel 和 Jackman, 1991; Pissarides, 2000），他们的分析认为，失业是长期延续的，由于持续作用的机制造成，而不是因为货币等短期因素。尽管如上文所述，我对“均衡”一词有保留看法，但我依然赞同他们有关市场的不对称特征的看法。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围绕某个中间值作对称的摇摆，时而由雇主、时而由雇员占据优势地位。力量的不对称长期延续。

市场的对称观念在经济学家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这方面，与从事实务工作的商业人士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生活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竞争。他们会为“竞争均衡”这样的荒谬说法感到困惑。如果所有的商品都能找到买家，而所有的买家都能找到满意的商品，还有什么竞争的动力呢？就像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都颁发金牌一样。竞争和“过剩”的存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人们对于这种现象的称呼是“过剩经济”还是“卖方竞争”还是其他什么，取决于各自的偏好，但重要在于，它们都描述了一种不对称状态。同理，也存在与之对立的另一种不对称状态：“短缺经济”或者说有利于卖方的“买方竞争”市场。^②

对两个新的市场体制的总结

我希望读者们到这个时候已开始形成有关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总体框架

^① 经济学家们最近几十年来经常采用“不对称性”的说法，但通常是指“信息的不对称性”。虽然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将其纳入本文的讨论却可能使论述思路产生混乱。例如，医生们所掌握的诊断和治疗的信息远多于病人，但是在某些医疗服务种类上，依然可以形成“买方市场”：如果病人是用自己的钱来支付医疗服务的费用，他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医生，而医生们将互相竞争，争取这些付费慷慨的病人。因此，我们这里暂不考虑信息问题，下文再作讨论。

^② 均衡概念的考察可以从多个方向进行，这里仅举出一例：增长的均衡性？增长是否会导致经济中的比例扭曲？这是个有趣也关系政策设计的问题，有关的研究文献很丰富，我也进行过探索。但本文并未涉及。

架，我们现在来进行总结。

这两个概念描述了市场的两种持续的正常状态。我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使用了市场体制（market regime）这个说法（Kornai, 1992, 第245~252页），在我的术语框架中，它们代表相同的含义。

在一个重要方面，我改变了以前的概念结构，使其与本章的思路挂钩。为了简化解释，我们仅用一个指标来集中反映某个经济体在某个给定时间的短缺程度，用另一个指标来反映过剩程度。如果能找到第3章最后一节描述的理想“综合指数”，那是最好，但在没有的情况下，其他任何能反映主要短缺现象或过剩现象的指标也能发挥作用。例如，以空缺岗位数作为短缺指标，以失业人数作为过剩指标；或者排队等候住房的人数作为短缺指标，以空置房屋数作为过剩指标。

短缺指标用“H”表示，过剩指标用“T”表示，我们暂时不考虑它们的具体内容或统计含义。

于是， $H = T$ 就代表实际上的“均衡”状态。例如，空置房屋数等于需要住房的人数，或者空缺岗位数等于找工作的人数。其他内容通过图10来进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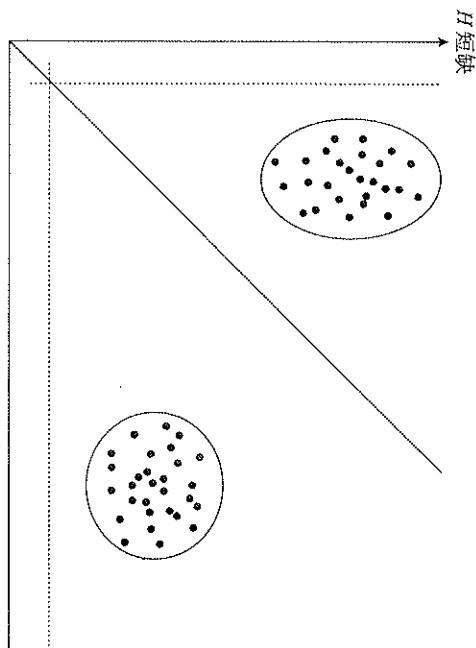


图 10 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图解

图中的45度斜线代表“净过度需求”为零的市场状态。坐标原点是瓦尔

拉斯均衡点，在坐标轴的附近还有两条虚线，显示的是最低的短缺和过剩水平。仅仅是因为摩擦的存在，市场上就不可能存在瓦尔拉斯均衡。甚至在过剩经济中，短缺现象也必然会出现，在短缺经济中，也会零星地出现过剩现象。

图 10 可以用来进行两种比较分析。一种解释是针对短期：两个国家，一个是短缺经济，另一个是过剩经济。图中的点显示的是两个经济体在不同年份的表现，并不存在“短缺经济的均衡”或“过剩经济的均衡”，这些点并不围绕某个均衡点进行分布，现实中也不存在那样的均衡点。这里我只是进行描述，论证参见前文的第 5 章第 1 节。任何时点“ t ”都对应着一对参数 $H(t)$ 和 $T(t)$ ，短缺经济的点都分布在左上方，过剩经济的点都分布在右下方，分别位于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的区域内。

图 10 的另一个用途是进行横截面分析。每个点描述的都是某一个国家在同一时间段的情况，落在短缺经济区域内的国家存在普遍的短缺现象，落在过剩经济区域内的国家则是以过剩为典型特征。其他解释则类似于以上对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描述。

这样的描述有助于给两种“市场体制”提供关键的定义。我没有能力也并不奢望预先给 H 和 T 设定精确的数量分界线，区分短缺经济或过剩经济。我在这里对它们的描述仅仅是泛泛地基于日常经验，经过冷静的分析，也可能找到量化的具体标准。例如，我想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区域找到一套住房，尽管出租房很多，我可能还是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这几个星期的寻找时间并不意味着短缺经济，只是表明存在摩擦性的短缺。于是， H 这个指标仍然会落在右下方的过剩经济的范围内。但如果我必须等上 5 年，才能获得地方政府分配的住房，那肯定是在短缺经济中， H 这个指标会落在左上方的短缺经济的范围内。

生活在短缺经济中的人，看到市场的指标在左上方的区域内运动，会感觉很正常。而生活在过剩经济中的人，则习惯于看到指标在右下方的区域内运动。^① 就像医学和其他研究生命的科学那样，对于“正常值”的定义（如血糖或者血压的正常水平等）往往不是特别精确的某个固定值，而是一个可接受的区间。区间的划定或测量只能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观察和经验来取得，加上统计分析工具的帮助。

现在对两种经济体制的定义进行总结。短缺经济是这样一种市场体制，短缺现象的出现是普遍、长期和频繁的；其中也可能出现过剩现象，但过剩的现象是孤立的、暂时的，尤其是罕见的。

过剩经济是这样一种市场体制，过剩现象的出现是普遍、长期和频繁的；其中也可能出现短缺现象，但短缺的出现是孤立的、暂时的，尤其是罕见的。本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反映实际的市场状态的指标从历史上看并不是集中分布在 45 度斜线附近，而是要么靠近左上方，要么靠近右下方。45 度斜线代表市场中的对立面的一种完美的对称状态。如果市场表现为围绕某个均衡点进行对称的波动，其数值点应该散布在中间的斜线周围。图中的两个点集的位置则意味着真实的市场状态是不对称的，一个区域由短缺现象主导，另一个主要表现为过剩。

习惯采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可能希望有更严格的定义，可惜我无法提供。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观察或许可以提供更严格的规定。但在此之前，我希望不要故作精确。曾经在“铁幕”两边生活的人们应该很清楚，图中左上方和右下方的区域都各自意味着什么。

图 10 中仅包含一种变量， H 和 T ，但实际上，在任何时间、任何国家都存在成千上万个此类变量。本文的论述意味着， H 变量中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T 变量中也是如此。这又是一个主要靠实证来回答的问题，我所知道的仅限于自己的观察。

这个问题有必要开展广泛的研究，完全有可能编制出中介指标或综合指数，用多于两个但又不至于上百万个（5、10 或 20 个？）指标来描述各国的市场状态。我们的视觉想象仅限于三维空间，但熟悉数学方法的读者们知道，即使没有视觉上的表现方法，以上的观点还是可以用 n 个代表短缺或过剩的指标来表达，一个国家的 n 个指标对应着多维空间的一个点。

(A) 如果在 n 维空间中，代表短缺和过剩程度的指标的多个点集中分布

^① 在早期的著述中，我曾采用“正常状态”来描述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现在决定放弃。“正常状态”实际上是静态均衡的同义词，是数学模型里可以采用的概念，但不适合用来描述实际的经济状态。按照本文的思路，在过剩经济里，过剩指标落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但并不在某个特定的均衡点。

域)，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体制就属于短缺经济。

H 和 *T* 指标的分布会不会很分散，还是集中成两个集群、分布在 n 维空间的两个预定区域内，这必须通过实证计量来证实或否定。在过剩经济中，短缺表现为例外情况；反之在短缺经济中，过剩是例外。

在实证检验完成后，许多方面的限定条件必须加强。“例外”是什么意思？指标的数值必须落在某个区域内，具体是什么标准？等等。我认为在本文中不必立刻进行这样的量化分析，可以等这个领域的系统的实证研究开始后再展开。

以上有关两种市场体制的陈述所欠缺的不止是实证研究的支持，也缺乏对短缺现象和过剩现象出现的因果关系的深入思考。引发短缺和过剩发生的机制在前文已多次提到，下面进行总结。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导致过剩经济的产生：因果关系链

我这里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阐述这些命题。

命题 1：只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才有能力产生和持续产生覆盖整个经济体的过剩经济现象，只有资本主义能产生和持续产生导致长期过剩经济症的机制。

这个命题是可逆的。

命题 2：如果某个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经济运行必然表现为过剩经济。过剩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不因为政府执行了某种经济政策才出现。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和价格政策可以强化或减轻某些过剩现象，但并不是过剩经济产生的根源。过剩经济的出现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组成要素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志。

这是实证的描述。对于资本主义是过剩经济这个事实，你可以感到高兴，也可以予以谴责。规范研究将在下文再讨论。这里所陈述的内容仅限于：

以上有关资本主义和过剩经济的命题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下面我要再加上几条总结性命题，针对我在早期著述中分析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命题 3：只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有能力产生和持续产生覆盖整个经济体的短缺经济现象，只有社会主义能产生和持续产生导致长期短缺经济症的

机制。

这个命题是可逆的。

命题 4：如果某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运行必然表现为短缺经济。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不因为政府执行了某种经济政策才出现。计划和经济调节可以强化或减轻某些短缺现象，但并不是短缺经济产生的根源。短缺经济的出现是因为它是社会的组成要素之一，而且是重要标志。有社会主义的地方，就有短缺经济。

这里我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观点，后面将进行更细致的阐述，允许例外、混合类型和转轨类型的出现。但首先，我希望读者注意到，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经典”形态并没有向任何形式的“中间道路”趋同。^①

我在上文多次使用了“命题”(proposition)一词，采用“推测”或“假设”或许更符合学术习惯，但我感觉不必那么谦虚。我所表达的观点有日常生活中的万千事实作为支撑，试图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几乎有些多余。还有，本文包含的 6 个表格和 10 个图表从统计上也支持这些命题。我希望强调，读者能通过这些数据形成对上述命题的认同感，它们并不是严格的“证据”。

我的命题既不是空泛无物，也不是同义反复。它们完全有可能被反驳，我个人也必须抱着对自己观点的怀疑精神进行更多研究，批评我的人完全有机会推翻这些命题。

以上四个命题预示着一个因果关系的存在。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是因，过剩经济或短缺经济的表现是果。然而在因果之间，还存在更复杂的中介性的因果关系链。在下面讨论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我会更详细地阐述其中的因果关系（如图 11 所示）。社会主义的因果关系链则可以参考我过去的著述。^②

图 11 中仅包含本文已经讨论的部分因果关系，它们代表着复杂的作用机

^① 如果我打算用均衡理论的数学模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我需要设计的模型应包含两个均衡点，一个是短缺经济均衡，一个是过剩经济均衡。在模型的虚拟世界中，整个系统将围绕其中一个均衡点运动。这一模型将有助于显示，要让系统脱离一个均衡陷阱，进入另外一个，必须改变哪些参数。也许我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重新设计这样的模型可以大大帮助那些习惯于均衡模型的经济学家理解和赞同我的理论，他们很多人只能看懂那样的语言。还有，今天的很多模型已具有多个均衡点。

^② 参见《社会主义体制》(Kornai, 1994)。短缺经济的因果关系链的描述在其中的第 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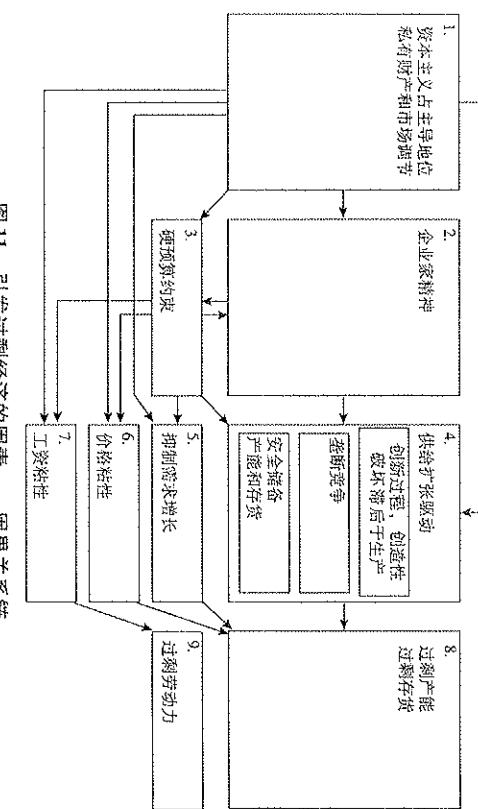


图 11 引发过剩经济的因素——因果关系链

制，该图的目的仅是提供一个概要介绍。

图 11 还远未完成，本文已讨论过几种因果关系尚未纳入其中，但即使如此，图示已经显得有些拥挤了。为清晰起见，代表因果关系的箭头都是从左至右（除一个例外）。那表示主要的作用方向，其实同时也存在反作用。例如，卖方竞争产生了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同时又在加剧竞争。为图示的清晰起见，反作用的箭头被省略了。

请注意，图 11 中的因果关系链从左方的共同因素开始，最后投射到右方的两个平行部分：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过剩经济。或者说，在我们考察资本主义制度时，实体经济领域的两个市场都表现为过剩经济。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中，既存在长期空置的产能和存货，又存在长期失业，即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两种现象可以追溯到共同的起源。^①

以上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前面几章的论述思路总结出来的，其真实性可以通过实证来检验。如果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存在广泛、频繁和持续的供给过剩，同时又存在广泛的、频繁和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则可以将其推翻。但如果过剩现

象虽然伴随着相反的迹象，但只要短缺是微弱、局部和过渡性的，该观点则不会被推翻（例如，在普遍的过剩经济中，某些特殊部门存在劳动力短缺）。

在图 11 所示的过剩现象的解释变量中，我只列举了那些与经济制度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一个国家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内容是本文的研究主题。但我并不否认其他因素也会对过剩和短缺现象的出现产生影响。

(1) 有一类因素关系与摩擦、失调和信息不畅有关，这在上一章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部分进行过讨论。

(2) 供给、需求和定价过程还受到政府的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财政和货币政策。这种情况在不同经济制度下都存在，但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作用方式、传递渠道和影响程度却存在本质区别。在“导言”部分曾指出，本文对此仅点到为止，而不做深入分析。

借用图 10 所反映的图形来说，第一类因素会影响点集的位置。摩擦越少，适应程度越好，整个点集就越靠近两侧的虚线（代表短缺和过剩的最低水平）。只有在理论模型刻画的虚拟世界中，才有办法达到坐标原点（零短缺和零过剩的瓦尔拉斯均衡点）。

第二类因素（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可能导致点集向任何方向移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①（在讨论特殊情况的后面一章还会做简要讨论）。例如，政策有可能在典型的资本主义过剩经济中加剧过剩的程度，减少短缺的发生，导致点集向右下方移动，也有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不过，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迫使该经济体跨越到 45 度斜线上方，将其变成一个短缺经济体。那需要对整个经济制度进行改造，相当于俄国在 1917 年或者东欧国家在“二战”之后的程度，也就是说图 11 中的方框 1 中的内容要发生激烈变化，由公有制和官僚机构的决策来取代私有制和市场配置的主导权。类似的，没有任何财政和货币政策能把短缺经济的值域推过 45 度斜线。那需要反方向的根本性制度变革，由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

^① 這并非不證自明。宏观经济领域就存在争论，例如有关当前的经济危机的起因，是因为上升周期的过度投资，还是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这两个因素都可以用本文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参见第 2 章第 4 节。

^① Leijonhufvud (1973, 2009) 在他的文章中用另外的比喻阐述过类似观点：宏观经济可以在一个“走廊”中运动，而宏观经济政策则试图产生巨大冲击，导致经济与端壁发生碰撞，脱离走廊会产生严重后果。他的思想也不是关注某个特定的均衡点，而是认识到市场状态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变化（走廊内部），这也和本文一致。

遗传倾向

虽然我做表述时尽量小心翼翼，读者们还是可能从因果链的描述中感受到，我认为这样的因果关系是决定性的。给定解释变量的不同数值，就会决定被解释变量的数值。我并不否认这样的简单推理。

在本文和我以前的著述中，我用“特征”之类的说法来描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事实上，体制的固有特征是一种倾向，类似于一个人的遗传倾向。例如，我们的血管都会随着年龄增大而硬化和钙化，但这个变化倾向的力量对每个个体而言不尽相同。我们也不是完全听天由命，饮食习惯和其他生活方式都会影响这一进程。不过，整体的变化倾向却是由遗传密码内定的。

即使在斯大林或毛泽东当政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也各不相同，出现了很多差异，但它们的遗传倾向是先天决定的。从逻辑推导和实证检验都可以发现：政治权力垄断、一党制和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化的中央集权体制。

你可以同这种倾向进行抗争，但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它不但表现为每个人的内在倾向，还表现为从前人那里继承的家族倾向。例如，在某人的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中，很多人都曾罹患过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我们当然会担心这个人也带有此类疾病的遗传倾向。它可以视为一种随机性质的警告，患病的风险随着年龄递增。

在面临这样的风险因素时，我们不要奢望对其取得什么最终胜利。有的人很注意饮食，适当开展体育运动，不吸烟，也不会经常感到压力，他们在有效地与自己的心脏和循环系统的致病倾向进行抗争。然而，放松和危险仍随时可能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可以被视为类似的倾向，它可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也可能被各种因素压制（如受到决策者、社会道德规范、法律和政府干预措施的调节等）。^① 可是，内在的力量仍然在发挥作用，不可能通

过社会控制或政府管制将其消灭，它们深藏在资本主义的基因之中。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资本主义还同样包含雇主抵制雇员的薪酬要求的基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会给予某些雇员群体支付效率工资，或者会从慷慨的角度好心地提高一点点待遇，如为了减贫等。但是，作为雇主的天然立场会使他们严格控制工资成本。这并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经理只有在上级的压力下才会选择同样的立场。

遗传倾向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异，对于社会组织、系统和子系统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对于那些习惯用数学模型中的变量来描述经济组织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者而言，这尤其值得重视。例如，关于酗酒的行为模型可以假定，喝掉的啤酒瓶数是一个非负的整数“X”。生物学上的因素会给这个变量设置一个上限：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大的胃口喝下 20 瓶啤酒。对于一个研究酗酒的动态模型而言，变量 X 是从 0 增大到 10，还是从 10 减少到 0 并不重要，但我们却很清楚，酒精上瘾和成功戒酒这两个过程是非常不同的。标准的经济学模型还没有准确地表达这个现象。而行为经济学已经通过出色的心理学实验证明，获得 100 美元的收入与遭受 100 美元的损失对人们的影响程度不同，行为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为“损失规避”（aversion to loss，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 1991, McGraw 等人, 2010），它目前还没有被主流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家们接纳。

这个现象在本文的论述思路中极具重要意义，我这里做一些回顾。
•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创新在汹涌推进，参与创新的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满足。而破坏是一剂苦药，失败者会进行抗拒，对必然消亡的事物表现出心理依赖。至少暂时保留那些本应淘汰的东西，也符合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或者他们会这样认为）。

• 赢得竞争的人感到快乐，至少在客观上改善了自身的境遇，如增加了市场份额等，于是扩张成为很强大的动力。但是对失败者而言，地位的丧失并不像体育比赛中那样会自动完成，与胜利者的扩张幅度相比，表现糟糕的人并没有大规模撤退，这正是过剩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

^① 这里我想再次提到阿克洛夫和希勒有关凯恩斯的动物精神的著作（Akerlof 和 Shiller, 2009, 中文版《动物精神》一书参见中信出版 2009 年版。——编者注）。两位作者对这一心理现象进行的解释，在各个方面（但并非全部）与本文所说的制度的“固有倾向”是类似的。

•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在调整价格时并不会因为提价而感到内疚，它们只是想获取更多利润。但降价却是个不愉快的事情，也更难执行。降价比涨价的难度更大。此类不对称性也是过剩产生的一个解释。

几年前我曾提出，市场状态（持续的趋势）带有不对称的特点，损失规避心理可以对此做出部分（但不完全）解释。这种倾向是单向作用的，反向作用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需要与强烈的自发力量相对抗，经常还只能取得部分成功。

这个观点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我们需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哪些现象或作用过程是属于“内在”的、“遗传”的倾向，哪些又是因为特定环境造成。这些倾向的强弱程度也同样关系重大。

在政府和其他组织试图反抗那些强大的自发倾向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有充分的理由），它们会清楚无误地看到：任何一种监管障碍或政府干预，都在被遗传倾向的拥有者们不断地挑拨和规避。

6. 过剩经济的影响及其评价

影响的分析和价值的判断

本文的第2章到第5章采用了实证方法来分析过剩经济的现象及其产生原因。现在转向其影响的讨论。我会尽可能把对影响的客观描述与价值判断区分开，判断不可避免带有主观因素，任何评价都基于特定的价值观。对于每个项目我都会加上自己的评价，同时也提到与我不同的其他人的评价，尤其是那些在公共讨论中经常出现以及对公众观点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由于存在强烈的因果联系（图11），很难分清楚哪些影响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哪些又来自市场的过剩经济特征。我将重点分析后者，不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的评价，而是针对过剩经济（卖方竞争、产能和存货闲置、劳动力过剩等现象）的影响这一内容进行分析和评价。这意味着，我将忽略某些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如民主、人权、宪政等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内容，因为它们与过剩经济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

创新

对于促进和制约创新的因素，能找到各式各样的大量研究文献。^① 人们广泛认为竞争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尤其是通过最常见的垄断竞争的形式）会产生过剩，它与竞争互为因果关系，因为生产商希望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产能，出售累积的存货，也希望通过新产品和新服务来抢走客户。可以很容易地从逻辑上推导出，没有过剩，就不存在卖家之间的竞争，因为缺乏过剩产品的压力。如果过时的产品型号还有人排队等候，那么汽车厂或电信服务商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去搞创新呢？在过剩经济里，快速现代化的受益者包括所有通过技术进步使生活变得更加舒适、更有趣和更有效率的人，面世时价格昂贵的新产品持续降价，也会让更多的人得到好处。

这些思想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介绍，现在重提是为了对过剩经济进行评价。按照我的价值观排序，创新是过剩经济优越于短缺经济的首要特征。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判断，对很多人而言，“消费社会”这个说法是一个贬义词。他们认为，作为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层出不穷显得过于浪费、令人烦心。

不可否认，创新过程有着消极的一面：很难紧追潮流，人们在还没有熟悉新产品之前，就不得不去学习新产品的使用手册。这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来判断，是否值得为新产品的功能去付出那样的努力。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创新和技术进步也伴随着危险：创新可以被用于伤害性目的。但你不能用事后的眼光来看，我们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考虑到这点。

消费者做主还是消费者被操纵

可以迅速动员的大量存货和产能储备，让消费者拥有了广泛的选择，拒绝使用不合意的产品。过剩经济提供的这样一种选择权不仅是一种商业现象，本

^① 影响最大的当然是熊彼特 [Schumpeter, 1968 (1912), 2010 (1942)]，但其他人也对创新过程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我在一篇论文里回顾了主要的研究成果：《创新与活力》(Innovation and dynamism, Komai, 2010a)。

质上更是对人类的自由权利的拓展。在短缺经济里，选择权受到限制，人们被迫使用替代品，降低了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除物质层面以外，选择的缺乏还限制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度。

生产商和服务商都希望尽可能开动自己的产能，向买家推销存货。过剩的存在诱使他们响应消费者的需求。针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可持续的生产调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是中长期的调整。但是能够迅速动用的存货和产能储备可以缓解这种停滞，过剩是一种“润滑剂”，可以减轻机器设备的调整摩擦系数。

我不希望把过剩经济中的买卖关系理想化。有人说，过剩经济（或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消费者的统治权，这有些夸张。作为臣民，需要向真正的统治者上供一切物品，但这里显然不是，主要原因是供给经常会激发需求，尤其是通过新产品和服务。其次，作为整个图景的一部分，卖方不但在积极影响买方的偏好（通过提高清晰有效的信息），也在操纵买方。在短缺经济中，广告是非常无聊的浪费，但在过剩经济中则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那些出于其他原因认为过剩经济优于短缺经济的人必须接受大量广告促销的存在，有些广告是诚实公正的，但也有些在误导，企图欺骗消费者购买。从全社会的范围来看，广告的成本规模高得惊人。表8反映了几个国家的情况。

表8 发达国家的广告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975~2007年，%）

年份	阿根廷	日本	意大利	新西兰	美国
1975	n. a.	0.83	n. a.	n. a.	1.70
1985	n. a.	1.08	n. a.	n. a.	2.25
1995	n. a.	1.10	n. a.	n. a.	2.20
2000	1.20	1.22	0.69	1.34	2.52
2005	1.79	1.36	0.60	1.41	2.18
2006	1.99	1.37	0.60	1.33	2.14
2007	2.10	1.36	0.61	1.33	2.03

注：广告支出的指标包含以下内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直邮、账单和其他形式的广告。

根据这些数据来源的说明，尚不能确认是否涵盖了所有形式的广告支出。n. a. 指数据不可得。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自IMF（2010）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2010）；广告支出数据来自WARC（2007）、CS Ad Dataset（2007）和Dentsu（2009）。

在2000年代，美国的广告成本相当于GDP的2%，与某些政府支出项目相比，这一规模令人印象深刻：2007年，联邦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也相当于GDP的2%，家庭和儿童扶持项目仅为0.6%，警察和消防为1%（Chantrell, 2010）。

但在这个方面说得过头，宣称生产商是实际的统治者，也不正确。不管厂商在操纵消费者方面有多精明，只要有过剩的存在，消费者们依然有可能拒绝某种产品或者服务。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70）的话来说，存在一种“退出”策略：买方不需要强烈抗议，转身离开就可以。因此，如果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达，过剩经济中的消费者并不是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而是共和国的强势总统，他可以影响决策和进行否决。而在短缺经济中，并不存在这种“退出”选项：买方是臣民，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卖方乞求商品和服务。短缺情况越严重，他们的态度就越是恭敬。

显然，从过剩经济与短缺经济的对比中，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各种类型的权力、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在发生相互作用。而在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中，通常并不存在这样的论述思路。

生产率与合作

我刚刚介绍的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润滑作用，同样适用于生产过程内部。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下，原材料和部件的供应都会遇到各种问题，有的投人品不能按时到货，玩忽职守的情况可能发生，等等。但这些问题在过剩经济中更容易得到解决，存货和产能储备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动用。不管是经理还是员工，任何在生产领域工作过的人，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的日常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进行一番对比，都很容易感受到巨大的差别（前面章节的表3和图5）。与面临普遍紧张的、僵化的短缺经济相比，过剩经济的弹性要高得多，运行起来更加平滑可靠，也更具适应性。

这些差异显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率和增长速度有帮助，但客观地说，也必须承认“润滑”意味着有很大一部分资本被存货和产能储备套住了。很多人厌恶地将其视为巨大的浪费。

通过企业运营研究模型，可以从公司层面计算存货和产能储备的成本，并与投入品供应波动和不能满足买方需求的成本进行对比。但就我所知，还没有

人尝试从整个经济体的层面进行此类测算。

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并不依赖公司运营研究的精确计算。在对过剩经济进行此类成本收益核算时，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此庞大的存货和产能储备是物有所值，也可能认为大量积累存货和产能储备是资本主义过剩经济的天性，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价值观。

适应性

前文分别讨论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个人或家庭）的关系，以及生产商之间的相互作用。现在来看看全貌，经济体中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即使在短缺经济中也存在合作，几十年的生存历史证明了这点。

尽管过剩经济也存在摩擦，但它具有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合作关系更加顺畅、快捷和灵活，而短缺经济的适应性则显得僵化、笨拙和迟缓。有资本主义的许多赞赏者（例如大多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把这种平衡和协调作用视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优势，有人甚至将市场经济的全部美德都归结于此。但在我看来，排在第一位的并不属于静态适应的灵活性，而是过剩经济的活力、不可抗拒的创新倾向。当然我也把静态的适应性视为非常重要的优势。

平等

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在过剩经济中四处可见，只要付了钱，你可以购买任意数量的任何物品，购买仅受限于买家自己的钱包。反过来，买不起的人就只能少要点。

相反，短缺经济具有平均效应，但这绝对不是彻底的平均主义。有很多因素在抗拒完全的平均化。收入分配是不平均的，报酬的差异是社会主义经济有意而为的做法，出于各种原因：对业绩的鼓励，对政治支持和忠诚的奖励等。于是会出现同样的规律：有钱的人能买更多东西。

不平均的现象还不限于购买上面，配给体系公开地对那些与执政党关系密切或者有影响力和门路的人倾斜（如住房分配或短缺商品分配等）。

然而，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的工资和商品分配的不平均程度还是小得多。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够精确但大致不差的印象：在短缺经济中

物品较为稀少，但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

平均化的效应是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价格政策和福利体制实施的，最终会导致收入再分配。在短缺经济中，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免费的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包括那些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可能无力支付这些的贫困阶层。^① 房租和食品价格通过大笔的政府补贴压得很低，以照顾低收入者。

这样做的后果很自然地反映在市场的普遍状态下：免费或接近免费的产品和服务出现严重短缺。实现更好的平等，其代价是严重的短缺。短缺经济总体上是比过剩经济更加平均化，但为实现平均而进行的收入再分配进一步加剧了短缺程度。

物质主义与精神价值

过剩经济（消费社会）经常受到批评，使人“物质化”，诱使人们仅从物质的角度去考虑得失。^② 很多人指责铺天盖地的广告、堆满商品的购物中心、仓促面世的新产品，说它们制造了扭曲的价值观，削弱了人们对精神价值的尊重。

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个议题的考察应该让社会学家去完成，我这里只想基于过剩经济与短缺经济的观察冒险做出一番评论。20世纪70年代，我曾看到许多女性在莫斯科的百货商店中互相扭打、撕扯对方的头发，只是为了买到一款新上市的鞋子。与今天在众多鞋店里惬意地挑选过分丰富多彩的鞋子的莫斯科女性相比，当年那些女战士们的拜物主义有丝毫逊色吗？

历史上还有更为惊人的例子。与今天的人们相比，在斯大林时期的乌克兰和后来的中国，在短缺经济最残酷的岁月里，那些面临饥荒威胁的人们难道会更不在乎物质（谷物、面粉、土豆和面包），而更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③

如果说市场的一般状态（过剩经济还是短缺经济）与“物质主义”之间

^① 现在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兴起，将在第7章讨论。

^② 经济学说史专家们往往把对资本主义的此类批判追溯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975 [1899]）和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1958）。这里所列举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各种代号：消费主义、消费资本主义、经济崇拜主义、丰腴社会、商业主义等。

^③ 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研究契诃夫的文章里（1963, 第440页）曾引用他的语言来反对托尔斯泰的说教：“常识和正义告诉我们，与纯洁的生活方式和吃斋相比，进步和蒸汽机中有更多人类的爱。”

存在什么因果关系的话，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除其他影响以外，过剩经济还有助于信息和现代教育手段的传播（之前曾讨论过），渴望知识、新闻和精神价值的人们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选择。存货和产能储备的过剩也表现在出版商和书店的仓库里，表现在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单里，表现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里。在这样的供给过剩中，精化与糟粕并存。

腐败的方向

腐败存在于各种社会中，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受多个因素的影响。^① 我不会在这里讨论那个仍然无法回答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种制度的腐败问题更为严重。我只想关注与本文的主题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市场的……般状态对腐败是否有影响？

的确有。谁对谁行贿？这取决于市场是处于过剩经济还是短缺经济。尽量简单地说，短缺经济中的买方会用各种办法，包括腐败，去影响卖方。过剩经济的情况则相反：卖方会用各种办法，包括腐败，去影响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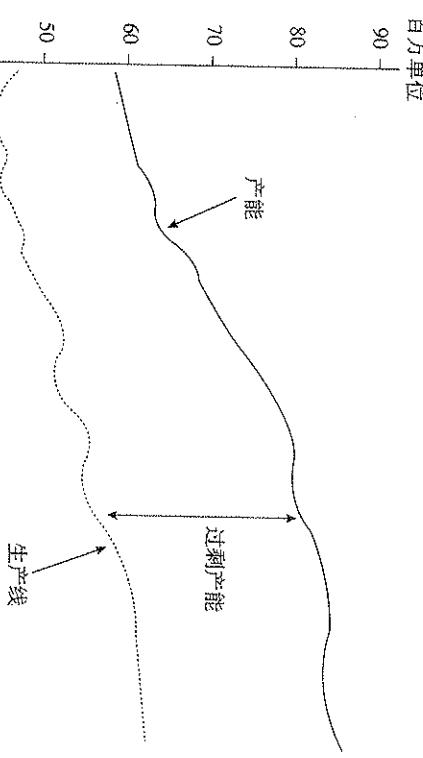
短缺经济中的腐败案例往往很不起眼。家庭主妇们会给屠夫塞钱，只为割到一块好肉。更严重的情况则包括，企业的采购经理贿赂供应商的代表，以确保自己的企业得到稀有的物资或部件。但在这些无关痛痒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以后，社会将变得非常畸形。

在过剩经济中，如果卖方能捞到个人好处，而买方又是使用公共资金，腐败的情况往往会特别严重。此时不是小偷小摸，而是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流入私人企业的账户。有人不惜给政府机关或其他公共机构的负责人数百万美元的好处，以确保自己能得到合同。对卖方来说，这数百万美元不过是交易的零头，但对受贿的公务员而言则相当可观。可以买通的人比比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环境所能产生的强大动力，前面我提到过卖方竞争带来的好处，但竞争同样会带来腐败的巨大诱惑。

资本主义竞争的优点与缺点，以汽车产业为例

我希望通过经济史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一个案例，来展示过剩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竞争的优点与缺点：汽车产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①

在所有汽车制造国，长时期里都会出现非常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图 12 显示，过剩产能的比重在 12% ~ 27% 之间，并且从 1990 年到 2008 年呈现上升趋势。在这个产业里讨论长期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合适的。



注：数据是指全球汽车产业，尤其是轻型汽车（在欧洲是指重量小于 3.5 吨的汽车）。
资料来源：Frances 等人（2009，第 2 页）。

此外，汽车工厂和汽车经销商那里还储备着大量的现车。^② 这个产业的所有分析师都清楚存在巨大的闲置产能和库存汽车，并不时发出警告。请看图 13。

^① 布达佩斯学院（Collegium Budapest）在 2002 年 3 月组织了一个作为跨学科的国际研究群体，由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和我领头，命名为“后社会主义转折时期的诚信”。

研究成果收录在两卷本的 40 篇论文中（Kornai 和 Rose-Ackerman 编，2005；Kornai, Rothstein 和 Rose-Ackerman 编，2005），其中包含腐败问题的详细的文献索引。

^② 其整体描述参见 Haugh 等人（2010），OECD（2009）和 Orsato 和 Wells（2006）。

② 虽然汽车工业的主要特征是过剩，某些豪华汽车在市场上却需要数月的排队等候，这是第 3 章描述的现象的一个生动案例，过剩和短缺可以并存，其中一个占据主导，另一个属于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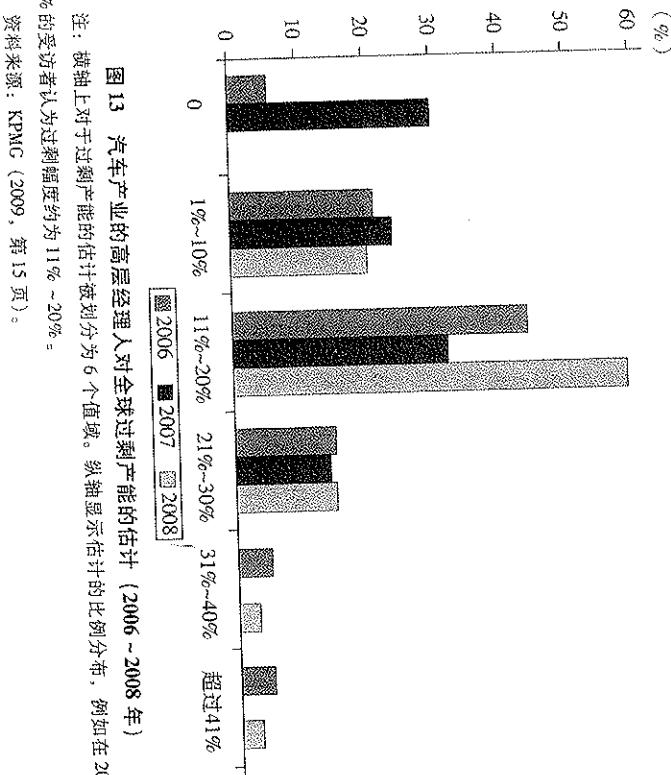


图 13 汽车产业的高层经理人对全球过剩产能的估计 (2006~2008 年)

注：横轴上对于过剩产能的估计被划分为 6 个值域。纵轴显示估计的比例分布，例如在 2007 年，32% 的受访者认为过剩幅度约为 11%~20%。

资料来源：KPMG (2009, 第 15 页)。

尽管所有的工厂经理都知道，从全球来看存在极大的过剩产能，他们仍然无法遏止自己的扩张冲动。每家企业都希望从竞争者手中抢走市场份额，更多的产能不断涌现。其结果导致，2008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汽车制造业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尤其是在美国。

汽车公司产量的下降会产生严重的乘数效应，因为它们的供应商及相关产业链在整个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出现了强大的救助亏损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政府实施了巨额的救助方案，也增加了未来对于预算约束的预期。第 2 章讨论过的阻碍创造性破坏进程的因素，在汽车产业中鲜活地表现出来。规模的扩张一方面意味着可怕的浪费，整个产业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汽车还污染了大气，交通事故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则是，汽车产业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快速而舒适的交通工具，汽车厂和它们的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产业竞争是技术革新的动力，让今天的汽车比三十年前的更舒适、快速和安全，汽车能源早晚会迎来革命性的突破。那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几个强大的遗传倾向在同时推动更新变化的过程，有利和不利

的影响都会出现。

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过剩经济与社会主义短缺经济再做一番对比。巨大的产能储备和存货当然占用了巨大的资源，但消费者只要有购买力，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满意的车型。即使不愿意马上付款，金融机构、汽车厂商和经销商也可以提供信贷。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汽车短缺程度令人压抑。在 1980 年代末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汽车供应缺口达到约 400 万辆，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过剩产能的三分之一。^① 在有的东欧国家，人们需要排队等候 14~16 年才能获得某些想要的车型 (Kornai, 1992, 第 236 页)。非但没有购车信贷，许多国家的购买者还必须提前支付全部或部分车款，或者说，消费者向生产商提供信贷。

在过剩经济中，汽车制造商积极推动创新。每年都会出现新的汽车性能：安全装置的改善，空调的改进，配备雷达预警系统等新型电子设备，娱乐设施（收音机、游戏机和电视机等）的安装，减少排放的技术革新等。在短缺经济中，技术进步则几乎陷于停滞：民主德国的特拉贝特和瓦特保、苏联的拉达等车型差不多数十年不变，最多会在很长的迟滞后从西方引进一些新性能。汽车车型虽然已严重过时，但如果人们还需要排队数年才能得到，又何谈技术革新的动力呢？

支持资本主义和过剩经济的立场

对过剩经济的评论及其与短缺经济的对比，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能得出怎样的基本价值判断？再次重申一下本文开篇的警示：本文只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方面，即市场的一般状态、市场制度和过剩经济。研究不是针对细节，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某些本质性的重大优缺点的分析。当然，对资本主义制度做总体上的价值判断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对雇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对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与不同类型的政府组织形式（民主还是专制）之间的联系等，可以添加的内容还有很多。

然而，我不希望彻底回避问题。我已经在其他著述中对于其他方面做出了某些结论，总是发现对资本主义有利的一些方面，当然我也从来不希望忽视其

^① 这一估计的根据是 Zsuzsa Kapitány (2010)。

消极的方面。在这里，我要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通过两个主要理由来证明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

第一，对民主的认同列在我的价值观排序之首。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不但提供了建立民主制度的充分条件，还提供了成功维护民主制度并对抗其反对势力的充分条件。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也是维护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一支持理由，我在这里仅能点到为止，在其他著述里已有过深入的讨论〔参见我的论文选集《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Kor-

nai, 2008)〕。

第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通过过剩经济的运转机制，这个制度可以驱动和维持快速的、不停顿的现代化、创新和技术进步。这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关系到对社会运动的规律和某些力量的共同作用的价值判断。这个理由让我们回到了本文的主题。在我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摆脱饥荒、掠夺和贫困，正在接触技术进步的成果，正在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而这样的进步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剩经济带来的。

我曾经列举的过剩经济的其他优点，都排在以上两大理由之后。我同时也抱有严肃的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利的看法。但从我的价值观出发，基于以上关于民主制度和技术进步的两大理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我选择支持资本主义制度。

其他许多人也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中间做出同样的选择。但这并没有完全回答其他若干重大问题。

几十年前，我在都柏林举办以伟大的爱尔兰统计学家基尔里 (Roy C. Geary) 命名的讲座。我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短缺经济，并指出它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但我也谈到，他们并没有失业的忧虑。在随后的讨论中，基尔里教授问到，爱尔兰能否在保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的丰富产品的同时，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避免失业问题的办法。我当时的回答与本文结论相同：不可能。产品短缺和劳动力短缺是长期性的短缺经济的联合产品。相反，过剩的产能、过剩的存货和过剩的劳动力则在过剩经济中相伴产生。选择某个制度的优点也就必须接受它的缺点。

与很大一类经济学家相似，我是从客观、现实的角度支持资本主义。但这

个群体并非完全同质，其中一个子群体是“天真的改革派”，^① 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所有固有缺陷都能被治愈，其中大多数人把国家干预当成药方。

另一个子群体（我把自己也划归其中）则不认为那些缺点可以完全根治。资本主义是个包含矛盾的有机体，其优秀和缺陷的品质都很突出，都是其天性。并不是由于政治家和官僚机构及参政专家们的努力，才让其优点突出地表现出来，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恶意、自私、愚蠢或意识形态的错误，才把邪恶释放。优点和缺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倾向，源自根深蒂固的利益驱动、行为模式和本能。

人们必须与这个制度无法治愈的先天缺陷共生。我们必须承认，有过剩经济的地方，就有商品存货的堆积，就有广告的泛滥，就会在公共采购中出现腐败的可能等。

我发现，典型的美国精神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认为所有问题最后都能找到解决办法。欧洲人（法国人？匈牙利人？犹太人？）则抱有更多怀疑，会承认有些问题可能没办法解决。

后面这种心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无可奈何，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减轻过剩经济的有害影响，例如：

- 企业可以制定采购和存货策略，使企业间的物流更加顺畅。在这方面我们能想到日本企业常用的眼球生产策略，此类策略的作用越显著，既定安全水平和客户满意度所要求的过剩储备的水平就越低。

- 政府可以通过监管和检查来确保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 通过制度化的犯罪调查来反对腐败，通过防范措施减少腐败发生的频率。

- 还有一个可能不合时宜的建议：中长期的计划手段。这不是指已经失败的社会主义的指令式计划体系，而是经过改进的指导性计划（类似于法国用过的类型）。在必要的试点后，这样的计划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需求预期和新增产能的协调，或许可以防止大企业的过度投资催生更多的闲置产能。

以上建议仅是几个例子，以显示通过对资本主义固有缺陷的冷静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及实施有力的政府监管和改革。

^① 读过我以前的著述的人可能会熟悉这一说法，很久以前，我曾用这个词汇来称呼那些希望通过体制改革来根除社会主义的所有弊端的人。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某些不利特征也是遗传性的、内在的、先天的和无法治愈的，就像资本主义的某些不利特征一样。

理论综合的范围及其局限

本文参考的文献涉及多个研究方向，列表中包含彼此观点相去甚远的学者、不同的学派和亚学派，其中既有正统也有异端，既有主流也有非主流。我曾经在以前的著述中讨论过如此多元化的学术继承关系，把自己的描述为折中主义者。在本文中，我仍然不拒绝这样的说法，此外还有了更宏大的目标。

我相信，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实证描述和解释后，有可能对不同的思想流派进行一番理论综合。从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角度去观察同一现象的学者，有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不是说，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所有的有价值的观点都能融合为一个大统一理论，这里要做的理论综合远没有那么广泛。然而就正在讨论的领域而言，还是有可能把我提到的各个学派的思想综合起来。本文不是要完成这个理论综合，而是试图勾画十个大纲。^① 我希望称其为实证综合（positive synthesis），实证的含义是，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人们可以对某个事实的理解和解释达成一致，并应用于政治选择和目标设定上。

表 9 “短缺经济—过剩经济”的实证综合的要素

主题	学者和学派	本文参考的内容（章节）
垄断竞争	张伯伦，罗宾逊，垄断竞争理论	
产能过剩	不完全竞争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	
创新	熊彼特	2 供给形成过程
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	
供给储备	运筹学的供给模型	
规模收益递增	卡尔多，阿瑟	

续表

主题	学者和学派	本文参考的内容（章节）
需求形成过程	非均衡理论学派	2 需求形成过程
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冲突	马克思	
价格和工资粘性	凯恩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2 定价过程 4 凯恩斯式失业
结构性失业	菲尔普斯	4 结构性失业
搜寻理论	菲尔普斯，搜寻理论	4 不匹配调整、摩擦性失业和搜寻
效率工资	斯蒂格利茨—夏皮罗模型	4 效率工资
市场的不平衡性	奥地利学派	5 “均衡”概念的实用性
演化理论	纳尔逊—温特模型，演化经济学	
遗传倾向	凯恩斯，行为经济学，阿克洛夫—希勒模型	5 “均衡”概念的实用性
损失规避	行为经济学	

表 9 的内容并不想面面俱到，甚至没有全部包括那些曾经在本文中提到的学者和学派，也没有给出名字或主题的索引。尤其不足是，没有把可以纳入这个新的实证综合理论的所有著作、理论和命题都包括进来。不过这个表或许可以为理论综合的范围提供一些提示。

编辑这个表的目的并不是清晰地展示理论的发展史或“功绩”。中同一栏的名单并不必然代表是谁首先提出或发表了某个观点。表中记录的名字和其他内容，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我所参考的研究方向。

表中没有专门列出制度经济学的部分，^① 因为我的整个研究的观点和理论框架都与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保持一致。这个学术传统在我过去的著述中也一贯如此。

^① 我不是第一个看到此类理论综合的可能性的人（如 Flaschel, 2009；Heilbrun 和 Breinbahl, 1986）。进行理论综合的人往往把两三位大人物的名字合起来作为代表，如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等，或者用“新”（neo-）作为前缀，如萨缪尔逊的“新古典综合”。或许“实证”是个更好的表述，“实证分析”可以覆盖更多的分支和学派。

^① 制度经济学有很长的发展史，最近几十年里的重要地位应主要归功于诺斯的研究成果：Douglass North (1990, 1991)。

我试图在表中强调，在构筑本文的思想框架的时候，我从其他学者那里借鉴了哪些元素。遗憾的是，这个蓝图也仅是半成品，整个理论框架还远未完成。不过我可以高兴地说，我所阐述的观点不乏知音，许多学者抱有类似的进行理论综合的目标。

在成功的可能性方面，看起来在劳动力市场实现这类实证综合的机会远高于其他研究领域。这或许是因为很少有人怀疑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过剩经济的特征，也不可能忽视失业问题的存在。其他过剩现象当然也存在，但不像劳动力市场这么引人注目。

在讨论理论综合的范围时，我几次提到实证这一特点。我从不回避现实。整理和综合的范围应该止于实证描述与规范分析（价值判断和政策建议）的分界线。跨越这条界线后，会出现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社会”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信仰。那将不再是保持客观性的问题，哪怕最迟钝的老学究也几乎不可能保持完全公正。

熊彼特是我的研究最主要的灵感来源之一，他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保守主义。米塞斯、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继承者们有关市场运转的解释给了我很多启迪，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右翼。凯恩斯是自由派政治家。尼古拉斯·卡尔多的思想与我有很强的学术联系，他在英国工党的左翼十分活跃。新凯恩斯主义的大代表人物在美国政坛上支持自由派的民主党。在分析过剩产能的时候，他们与今天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例如 James Crotty, 2001, 2002）有很多共同点。克罗蒂和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是公开的左翼人物。本文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

研究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有些类似于几位医生共同检查某个病人，他们得到了同一诊断结论，但对如何开具药方却出现了重大分歧。有人主张平静的化学疗法，有人主张进行手术干预，还有人认为既然病人反正会死，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徒劳的治疗。^①

对此我不再深入。例如，我不会对政府怎样应对当前的经济衰退提任何建议，虽然它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我坚持认为，对于一个有清晰定义的科研领域进行实证描述和解释，才是本文的目的。我相信对理论、科学解

释和研究方法进行广泛综合是可以实现的。

呼唤具有解释力的数学模型

在准备理论综合的思想清单中，有些理论带有数学工具。有的则没有模型。在这方面我并不希望在进行实证综合的时候有任何歧视。本文采取的是纯语言的表达方式，但如果有理论研究者受到启发，尽可能地把这些思想设计成模型，那会是非常有益的。

有人认为，数学模型是经济学研究走上错误轨道的元凶，我对此并不赞同。但我同意，数学模型的采用和数学化的经济理论传授有很多缺点，给这个学科造成了伤害。但对这个复杂问题的深入讨论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列。

我不反对用数学模型来分析本文讨论的现象。相反是欢迎和鼓励。很多时候，重大的新问题是用文字形式首先提出的，文字讨论可以对实际现象进行细致而多角度的描述，但这些只是科学理解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必须对概念进行更准确的定义，对其中的关系进行更严格的表述，从逻辑上清晰地显示何种条件对应何种结果。这些正是数学模型的用武之地。

我还没有在研究文献中发现有哪个模型能适用本文的思想，如果能找到，我会热心地学习，并用来自检验和澄清我的命题。如果数学推导发现了某个严重错误，我会大胆地修正自己的思想。

但我认为，本文所关注的整个问题恐怕很难在单个模型中进行分析。如果一个模型能够对大问题的一个方面或分支进行检测，我就可以满意，下面是几个例子。

第2章在讨论供给、需求和定价过程的时候涉及动态系统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过程共同导致了过剩的产生。我认为，这一理论可以通过微分方程组来描述。模型可以揭示怎样的参数集可以消除过剩，或者打破系统的平衡，使其转向短缺经济状态？怎样的参数集会引起反方向的变化，使系统最终由于过剩的不断扩大而崩溃？这个系统模型的哪些特征可能使瓦尔拉斯均衡不稳定，使市场的长期状态表现为短缺经济或过剩经济？探索的方向或许是使用突变理论或分岔理论的数学方法。

我和其他几位研究者（Béla Martos, András Simonovits, Zsuzsa Kapitány）

^① 主张把实证研究方法与规范研究方法区分开的一篇著名文章是：Heilbroner (1986)。文中指出，马克思、熊彼特和哈耶克三人的行动方案有巨大差异，这不是因为他们对现象的实证描述有多大不同，而是由于各自的政治信仰。

曾设计过一些模型（参见 Kornai 和 Martos, 1971, 1981），模型中可以出现过剩现象，存货的增加和减少是过程控制的主要信号，我们用的数学工具是微分方程。研究结果确认，这样的系统是可行的，容易受到控制。当然我们当时简化了设计，把技术和生产结构作为不变量处理，也没有关注本文的中心思想：持续变化和产品更新、熊彼特的创新课题等。

有一些重要而有趣的模型（其开创性研究参见 Aghion 和 Howitt, 1998）展现了熊彼特的思想，但它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创新现象，大多数模型都没有内在的激励和迫使创新的机制。

前文提到过研究规模经济递增的数学模型（Arthur, 1994; Helpman 和 Krugman, 1985），这些模型有很多优点，但还没有被用于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过程。

这方面的课题在数学上很难处理，在我看来，它们与液体和气体流动、气象变化或基本粒子运动等物理现象有相似之处。我还提到，它们与生物进化过程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或许那些学科的数学方法可以为这方面的模型设计提供参考。最适合的数学方法可能来自随机过程理论。

或许我们需要一个约翰·冯·诺伊曼（John Neumann）那样的天才来设计一套新的数学工具，以准确表达我简要描述的内容？在这样的天才出现之前，其他经济学家们可以选择两条研究道路。第一条，把研究主题限于经济学家们现有的数学知识可以回答的问题上，放弃为本文的大多数问题建立研究模型。第二条，不回避那些极其困难的问题，但只是用文字描述的方法来回答。我们知道这样的回答是临时性的、不完整和不精确的，但仍然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我本人所选择的就是后面一条。

7. 对特殊情景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本文一直在尝试对过剩经济进行一般性讨论。过剩的规模、比例和结构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各国的产能利用率集中在 80% 的平均水平附近，彼此的差异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过剩产生的机制构成在各国的不同细节。

本文并不分析各国的差异，当然这个内容并非不重要。本章要讨论的是过剩经济的市场状态和机制的临时变化，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划分时间界限。

商业周期的波动

产量水平不管高低，都不是一个常数，而是处于波动中，这个事实人所共知。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详细分析了需求、供给和价格在短期内的共同调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本文的主题不在于此。

经济学各流派对于商业周期的波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是指中期的波动。对波动的准确测算以及某些重要概念的定义（例如，衰退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已取得了共识，但有关周期的成因、影响的评价以及作为应对的政府经济政策，争论已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在最近一轮的经济衰退发生后（或许将延续到下轮衰退之前），争论更加激烈。在政治家、经济顾问和学者们中间，观点尖锐对立。

有关商业周期波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但本文的主题不是市场的中期运动，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永恒的、制度性的特征。当我们着手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时，曾经考虑到，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会被中期问题所困扰，忙于向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提供克服衰退的实际建议，但我还是坚持下去研究长期的持续现象。经济学家们中间有劳动分工，必须有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自愿承担这个任务，因为我的研究专长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这为探索它们之间的长期差异提供了基础。

在上述申明之后，下面将发表几点评论。我希望说服读者，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衰退、复苏和周期问题上的时候，我的思考也和这些问题有关。中期的经济波动的原因和影响，其实与它们所处的长期持续的市场状况密不可分。

即使在高度波动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市场状态依然位于过剩经济的界定范围内（参见第 5 章）。即使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当优秀企业的订单已排满，存货减少，产能提高，失业率降到很低，许多地方甚至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过剩经济也不会跃迁到短缺经济。

我们再看看前文的图 2：美国在 1965 ~ 2010 年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其中灰色的区域表示衰退时期。曲线出现强烈波动：产能利用率在衰退时期降到很低水平，但从未有哪个年份实现产能的充分利用，只在少数几年达到 88% ~ 90% 的高度。利用率曲线以上的区域表明，存在持续的工业产能过剩，幅度在

12% ~ 35% 之间波动。

一般地说，商业周期的波动局限在持续的过剩经济的范围内，这个范围是无边界的。如果经济迅速增长，就可能达到甚至突破最高界限，打破过去的纪录。^①但是在靠近乃至超越边界的时候，各种保护性的机制将发挥作用。有些机制是自发产生的：某些市场泡沫会自行破灭，其快速下滑还会拖累其他市场，过多的需求会导致价格和工资上涨，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周期波动时所说的上升周期（中期现象），与本文总结的过剩经济的特征（长期现象），对这些现象有着一致的描述。

有关普遍过剩为何能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数个世纪之前。教条主义者援引“萨伊定律”，试图证明任何供给都会创造出等量的需求。如果这个说法正确，显然就不可能存在普遍“过剩”。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诞生后，这一古老的争论重新提起。我要强调，当时的争论是关于整体经济在短期内是否可能出现生产过剩，凯恩斯主义认为有可能。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固有特点就是长期持续的过剩经济。

即使不考虑时期长短问题，也还有一个区别需要注意。本文一直避免使用“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的说法，如果严格地采用“持续的生产过剩”这一说法，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总产能足以提供的产量远远超过所有购买者的购买力之和；（2）过剩的产能被全部或几乎全部利用起来；（3）经济增长率导致这一失调现象长期持续。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会导致存货的超额增长，存货相对于产量的比例持续提高。“库存的咖啡被倒入大海”，这样噩梦般的景象会让人想起当年的大萧条。

我在这里试图更精确地描述生产、消费、供给和需求的动态过程。很大比例的闲置产能长期存在（机械、设备、厂房或劳动力），但这些只是“潜在产量”，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产品过剩”。经济运行中有大量存货储备，可以给买家提供选择，促进竞争，帮助减少机器设备的调整摩擦。但它们并不伴随着持续的存货扩张，至少因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会淘汰一部分产能和存货。

下面谈谈对因果关系的一致看法。

本文用来解释过剩现象持续存在的原因，与某些危机理论用来解释短期过剩现象的原因是相同的。本文对需求过程持续落后于供给过程的描述，与凯恩斯及他的众多门徒所说的需求不足是短期危机的原因有相似之处。我希望，尽管存在很多相似，但大家已经清楚，本文的观点与那些理论是在回答不同的问题。

我所陈述的理论并不表示，这是一个更庞大的宏观经济供给受到更庞大的宏观经济需求约束的案例。如前文所述，我提出了很多有关概念和测算的问题。我试图将研究主要建立在微观基础上。在垄断竞争中，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增加供给产品数量的同时改进了质量，开发了技术。许多厂商经常会在微观层面遇到需求的约束，尤其是在技术上落后于竞争对手或由于其他原因不受客户欢迎的时候。在有些情况下，某种创新会使市场上出现短缺，但过剩现象最终会变得更普遍、更频繁。

研究中期周期波动的经济学家们密切关注的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实证分析以及经济政策建议。我的论述没有涉及后者，而是致力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过剩经济。不过既然已接触到周期波动议题，我想指出，有关持续性过剩经济的研究可以为反周期政策的设计提供某些参考。

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一下，生产、投资和信贷的扩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遗传倾向来解释？剩下多少是来自政治家、政府、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错误和过失？即使承认前者是主要因素，也并不意味着必然采取消极的立场。然而在行动时需要认识到，经济的上升期是由巨大能量推动的，试图抗拒这种能量需要杰出的智慧和专业知识。

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更普遍的共识：扩张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在扩张最终遭遇环境制约的时候，就会出现收缩，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波动倾向。承认这些并不表示监管没有意义，但试图帮助决策者设计监管体制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抛弃幻想。在 1960 ~ 1970 年代的匈牙利改革争论后，人们发明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监管谬误”（regulation fallacy）。^① 政府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监管和偶尔的干预来控制事态，然而企业层面的决策者却知道如何钻政策的空子，这就仿佛一场军备竞赛，新武器的发明会不断招致更新的对抗武器。或许这方面最主要的启迪是，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影响并不全是有害或痛苦

^① 我这里要再次提到“走廊”理论（Leijonhufvud, 2009），我所说的过剩经济的崩塌界线，相当于走廊理论中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在正常条件下的运动范围。

的，有些影响是积极的、推动进步的。康德拉季耶夫（N. D. Kondratiev）和其他人的先驱研究以及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的名著（1939）都认为，技术进步在经济扩张期间呈现加速趋势。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在每次光辉的增长期不应该只看到越来越不负责任的企业间的相互勾结，还应该看到更多更快的创新。在互联网泡沫时期情况即是如此，泡沫的高潮伴随着信息通讯产业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创新的过程意味着尝试，每一次成功的背后可能有十次甚至百次失败。事后来看很容易说不应该把钱花在失败的项目上。过于严格保守的货币市场或许能够在短期内保持微观上的平衡发展，但也会束缚创新，因为创新总是伴随风险，有时甚至是非常高的风险。

反周期政策在周期的下行期间也是把双刃剑。第2章讨论过创造性破坏，它会淘汰大量的过时产品，消灭很多就业岗位。但在衰退期间，社会的团结精神和政治的选举机制会带来保护就业的要求，这会给革新造成阻力。

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较量是学说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今天来看，凯恩斯所说的“长期”已经足够长，他们二位也都早已作古。我们现在应该看看能够从他们的思想中整理出哪些内容，他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补，在哪些方面又是不可调和。

我这里要再次区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方法。看起来，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某些思想可以综合起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转。^① 但这里简单的实证综合还不能对此得出明确的结论。

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回顾两位大思想家的著作，具体分析他们为当时提供的政策建议，我考虑的是那些高举凯恩斯或熊彼特旗帜的人们所做出的贡献。本文对某些问题的思考与凯恩斯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一致，但并不等于支持庸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如，不惜代价放松总需求约束，以更多地利用产能）。本文的思考也和熊彼特主义的某些观点一致，但同样不等于鼓励庸俗熊彼特主义的经济政策（如，让危机随意肆虐，因为创造之后必然带来破坏）。

我的分析发现了某些深刻的伦理、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两难困境。我并不打算向华盛顿、柏林或布达佩斯的决策者们提供什么建议，我只想就本文的研究思路向经济顾问们提出告诫：所有可能的干预手段都可能有不确定的后果。

本文还给经济决策者们提供了另一个及时的启发。有关危机的国际讨论的焦点一直放在金融产业，原因几乎都归结于金融产业的监管松弛、监管机构的组织缺陷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扭曲上。实体经济的运转机制如何，哪些领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闲置产能，经济体的各个产业部门如何能够更好地协调发展，这些问题受到的关注太少。

战时经济

在战争期间，所有社会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包括经济的运转。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源被用于战争，它反映在几个指标上，特别是多大比例的GDP和劳动力在为军事部门提供直接服务。如果比例较小，资本主义经济将依然是一个过剩经济，仅会出现零星的短缺现象。军事活动的需求越大，战争的全面性质越突出，短缺现象的倾向就越严重。政府将对家庭实行配给，市民需要排队领取食物，官僚机构负责分配稀缺的原材料和半成品。随着战争的延续和破坏区域的扩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将更加强烈。^①

“二战”就让世界上很多国家品尝了短缺经济的滋味，它们在战争期间依然保持着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战时经济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过剩经济”这条因果链不能机械地或无条件地套用。战争时期的临时状况会制约或阻止产生过剩经济的机制，启动产生短缺经济的机制。

历史经验显示，一旦和平恢复，短缺经济或快或慢将重新让位于过剩经济，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础犹在。例如，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官僚化的中央经济控制体系，还遭受了战争的惨烈破坏，供给非常紧缺，但不过数年时间联邦德国就从短缺经济恢复成典型的过剩经济。

相比之下，在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私有财产被广泛没收，市场经济机制受到破坏，它们还来不及从战时的短缺经济中恢复过来，就陷入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短缺经济。

① 把凯恩斯和熊彼特的理论综合起来已经成为时髦，一系列研究成果都在文章标题中作了宣告。

① 有关战时经济的研究文献，我要特别提到 Galbraith (1952)、Milward (1979) 和 Olson (1963)。

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变化和持续倾向

本章的第1节讨论的是短期波动，第2节涉及战争引起的短缺经济，它可能延续数年，但仍然是短期现象。下面讨论持续性的倾向：稳定的、连续的、有阶段性的变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全部影响表现出来，但这些变化非常深刻，会给社会与经济的运转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影响也表现在本文所分析的运动过程中。

(1) 福利国家的成长

作为20世纪福利国家的基础的社会服务体系，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某些发达国家。各国的福利体系的范围和程度不同，但在所有发达国家广泛存在。

我这里并不想卷入有关福利国家通常由哪些要素构成的概念和统计上的争论，毫无疑问，其中包含若干免费或廉价的服务，例如医疗、教育、儿童看护、残疾人和老年人护理等等。这些活动都是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来自税收或强制捐献等准税收。

在免费或接近免费的公共服务的配置和使用中，普遍存在短缺现象。整体的经济环境基本上是过剩经济，伴随着所有常见的副作用，但在过剩经济的汪洋大海中能看到短缺经济的孤岛：医生的诊所人满为患，病人可能需要等候数小时，手术和诊疗的排队名单可以达到数月之久（表10）；病人选择医生或医院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事实上，有的医疗制度完全不给病人这方面的自由选择，必须接受指定的医生和医疗机构；强制替代的概念也适用于医治过程，病人可能得不到想要的药品、治疗或医生，而被迫接受分配的结果。

表 10 西欧国家医疗服务的等候时间（2004年，星期数）

国家	专家门诊	门诊手术	住院手术
奥地利	1.83	3.11	7.91
丹麦	5.27	10.24	9.44
法国	3.14	3.30	8.14
荷兰	3.47	5.63	11.48
意大利	2.93	12.00	9.40

国家	专家门诊	门诊手术	住院手术
德国	1.84	3.08	6.49
西班牙	4.94	17.60	24.10
瑞典	9.65	18.46	28.14

注：表中指标的计算依据来自 Survey of Health, 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SHARE)，包括9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样本。数据来自该调查的第一阶段的成果。受访者需要回答如下问题：

- (1) 为接受专家门诊需要等待几个星期？
- (2) 上次门诊手术等了几个月？
- (3) 上次住院手术等了几个月？

为进行比较，答案都已换算成了星期数。
资料来源：Sciliani - Verzulli (2009, 第1299~1300页), SHARE (2010)。

需要注意，这样的短缺现象并不限于政府直接管理和资助的福利网络，那些大型的、机构化的、受到严格监管的私人保险制度的客户也可能有类似经历。

美国的医疗体制能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在美国的医疗体制中，存在各种等级的服务，一个极端是少数有能力自掏腰包，请最有名的专家、去最昂贵的私人医院的人，我们此时又能看到过剩经济的典型特点：服务商有强烈的经济激励来做好自己的工作，客户则有充分的选择空间等。另一个极端是完全没有保险的人，很多人只能求助提供免费服务的紧急医疗机构，即使他们的病情并非危急，也会去那里尝试医治（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有可能大幅减少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这个部分是典型的短缺经济特征：拥挤，排队，往往会影响到傲慢和粗鲁的接待等。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其他等级，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的特点交织出现。许多雇主会为雇员提供一份费用清单，让他们从中选择保险计划。较廉价的选项可以降低缴费标准，但没有更多的医生和医院可供选择。指定的医生在诊断、开药和手术建议时也会遇到各种限制。保险计划越是昂贵，病人就越能感受到过剩经济的好处。最昂贵的保险计划可以提供几乎无限的医生和医院选择，承保人会为医生和病人同意的服务埋单。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虽然政府管理和资助的公立医疗部门所占的比例很大，但医疗产业中也包含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纯粹商业化经营的私人部门。其中包括私人拥有的医院、疗养院和诊所，独立执业的医生以及营利性的实验室，还可以包括制药产业、医疗设备制造商和药店等。私人医疗部门的运转具

续表

有典型的过剩经济的特点。^① 这在制药产业尤其突出，存在激烈的垄断竞争、活跃的创新、丰富的选择、汹涌的广告、对消费者的操纵，以及经常被藏在暗处的对处方医生的贿赂等。

医疗服务的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相反，某些教育服务的需求却可能已被过分满足。各国的法定教育年限存在差异，但是对法律规定的年龄段，教育需求的规模应该是已知的。^② 市场的一般状态导致的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突出，一旦高等教育免费或者廉价提供，短缺经济的常见症状就会出现：申请人数太多。可以接受的学生人数要么受到严格限制，要么在招生人数太多后，导致教室的过分拥挤和教师的超额工作。高等教育机构会变成文凭工厂，以牺牲质量作为代价。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过高。^③

而在那些没有把高等教育视为普遍权利、必须收费的国家，机构和服务的提供以及申请人数则表现出接近过剩经济一般状态的特点。过剩现象也伴随着短缺，例如申请名牌大学的学生大多。过剩经济的产生机制在发挥作用：垄断竞争、创新和供给方的活力等。希望得到并有支付能力的人将获得高等教育，没有支付能力也未能获得奖学金的人则将失去机会。

应该如何界定免费的福利国家服务的范围？适用怎样的条件？这方面的选择会遇到某些严重的伦理和政治两难。一方面是改进效率和提高质量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考虑人权平等和社会正义。

我在其他研究中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讨论过福利国家的问题（Kornai and Eggleston, 2001），本文主要是对极其重要的历史倾向的实证分析。在一个过剩经济体中，与福利国家制度有关的免费服务的范围越广、水平越高，短缺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于是我们听到，反对福利国家制度的保守主义者在高呼，“我们被社会主义占领了！”幸运的是，那只是口号，而不是实情。免费的公共服务的确带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特征，会产生深刻影响，有好有坏，有进步，也有破坏，

包括短缺现象，但这不是事情的全貌。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开始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高等教育服务时，议会民主制度并没有崩溃，也没有秘密警察组织的横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压制式的政治权力集中和垄断。福利国家制度则是在民主政治的宪政框架内建立的，其运行与民主制度协调一致。

(2) 预算约束的软化

建立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个主要特点是“软预算约束”综合症。^④ 这一特点加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了短缺经济的出现。

可是，软预算约束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制度。我已经几次提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同样会出现，例如，在政府出手拯救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时候，包括医院、大学、小农场、银行以及地方政府等。这样的救助行动往往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救助的影响不限于受救助的对象，还会波及其他经济当事人。救助行动越是频繁和重大，各种机构的负责人就越是相信，自己在遇到麻烦之后也会得到政府的援手。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我得到的印象是，预算约束的软化成了一个长期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启蒙时期，人们都抱着铁石心肠去收债。后来，财务纪律开始松弛下来，救助行动越来越常见。由于担心少数大企业、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破产，会引发连锁式的企业倒闭和清算风波，政府进行救助几乎不可避免。

这样的预算约束软化会如何影响整体经济的过剩特征呢？

可以预计，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都指向过度供给的方向。第一个影响在第2章有关供给过程的部分已经做了解释，认为闲置产能的出现和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影响被削弱是过度供给的原因之一。即使预算约束依然严格，受到创新冲击、在竞争中失利的企业仍然会尽可能久地支撑下去。例如，在塑料制品得到普及，机械设备小型化降低了对钢铁产品的需求之后，“锈蚀地带”的产业依然维持了很长时间。老板们接受了利润的缩水，员工们也愿意忍受低工资，不希望彻底失去工作。我在前文指出，求生的本能自然会产生闲置产能。还要考虑到雇主、雇员和当地居民给政府施加压力，拯救和维持那些夕阳产业。这些施压往往能获得成功。或者说，预算约束的软化阻挠了破坏过程，过剩产能没有被及时消灭。

许多国家在农业领域遇到过类似情况。市场竞争会淘汰许多农场，尤其是看到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并存的现象。

^① 哈佛大学的瑞尔曼（Arnold Relman）研究了美国医疗体制的商业化现象，发现没有监管的“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这是瑞尔曼的说法）导致了过度供给和过剩产能（Relman, 2010）。

^② 但是在质量较差的学校，教育的供需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缺口，因此我们能在义务教育领域看到过度供给和过度需求并存的现象。

^③ 文凭工厂的产量超出许多国家对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高素质的员工经常从事低端的工作。免费的教育服务导致需求膨胀、产量增加，毕业生过度供给。

^④ 理论和文献综述参见 Kornai、Maskin 和 Roland (2003)。

技术过时的小农场。然而，农业领域的游说集团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在很长时间里维持这些亏损的农业组织的运营，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大量剩余的出现和持续。

预算约束软化的第一个影响是减缓产业退出，改变供给过程，第二个影响则是加速产业进入。

这里我要超越本文原先设定的范围，讨论一下金融产业的贷款业务。预算约束的软化和救助预期的反复强化，导致银行对贷款业务的责任心下降。太多时候，轻易得到的贷款形成了新的产能，结果导致过剩产能的持续膨胀。如果在企业失败的时候很有希望获得政府救助，借款人和贷款人都会产生过分冒险的倾向。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受到硬预算约束的遏制。预算约束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软化后，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带着社会主义投资决策者的气魄进入高风险投资项目，许多果然没有失望。本次经济衰退中，我们也看到，在汽车制造等产业的庞大过剩产能和滞销导致财务崩溃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给许多大企业扔去了救生圈。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经济政策中的救还是不救的两难问题，每个救助决策背后都关系到严重的宏观经济和社会问题，牵涉到政治和伦理上的困境。我想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指出的，仅仅是这种长期倾向的存在。

作为对预算约束软化的总结，让我们回到一个实证的观点：尽管软化的趋势很明显，硬预算约束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3) 全球化

为简化起见，之前的论述并未涉及国际贸易。不过，在讨论垄断竞争的时候，一个生产商显然不但需要与国内对手较量，还要对付进口产品。进出口贸易已有数千年历史，到今天，由于全球化这一复杂而广泛的变化进程，国际贸易的作用已大大提升。

让我们看看进口的影响，它和“可以立刻动用的过剩产品”非常类似。进口产品不需要摆上货架或者仓库，已足以让国内厂商感到竞争压力。如果能通过进口获得质量相当，甚至更好，或者价格更为便宜的产品，就足以引起过剩经济现象。

全球化的一个影响是，过剩产能的分布在全球范围内不停地改变。许多出口产品的生产正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兴起，欧洲和北美提供类似产品的企业则遇到销售难题。它们不会马上关门，有的会调整产品类型，继续生存，有些早晚会被淘汰。总之在剧变时期，它们的产能大量闲置。

许多曾经落后的经济体现在迅速成长，形成新的产能，并把目标市场主要瞄准发达国家。然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扩张速度落后于投资者的预期，过剩产能也会出现。^①

(4) 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在讨论快速进步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买卖方关系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情形，回顾第4章所讨论的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几个话题。买方和卖方必须相遇，这被称为匹配问题。生产商需要了解用户的信息，卖方需要了解买方的信息，以及相反的信息流等。前文曾指出，这个问题不是某个制度特有的。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求生产商与消费者、卖方与买方的匹配，所有人都需要信息。但制度特点却会影响作用过程，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这两个经济体系，在信息获取成本由哪方承担和信息获取的程度上，存在重大差异。

在短缺经济中，主要靠买方去获取信息，买方可能在第一家商店找不到自己需要的物品，再去其他商店寻觅，如果运气好，或许能如愿以偿。类似的，生产企业的采购员必须努力搜索需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

有些信息收集工作是由官僚组织负责，在计划经济体系内，对某些关键投入品进行分配。生产商和销售商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很舒适。它们完全不需要亲自去寻找客户，官僚组织会给他们安排销路，或者客户自己会找上门来。

在过剩经济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流的任务则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官僚组织不发挥作用，大多数努力来自卖方。庞大的广告工具采用轰炸的办法给客户传递基本真实的信息，当然前文也曾指出，有些信息是单方面甚至完全误导的，试图操纵消费者。

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前，过剩经济中的买方也不是完全不承担搜索信息的任务。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同，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统一的，买方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去搜索最低廉的报价。卖方的竞争并不限于价格，它们会提供额外产品或特殊产品、不同品质的产品，甚至全新的产品。某家商店中没有的商品可以去其他商店找，或找到非常类似的，或许更好、更便宜的替代品。的确，作为过剩经济的突出优势之一，丰富的选择是促使买方搜寻信息的另一个动力。^②

^① 其中一篇文章是：“China: the vicious circle of excess capacity” (Autus, 2009)。

^② 我夫人曾经在1970~1980年代和我一起经常往返于匈牙利和美国，她经常说你在布达佩斯必须逛商店，因为有短缺，需要追踪有哪些商品出现。其实我们在美国也要花同样多的时间逛商店，但主要是想找到最合算的价格，发现促销机会，或者在很多的选择中挑选出最合意的。

互联网的到来使这种传统的劳动分工发生了巨大变化。买方如今可以更轻松地获取更多的供给信息：有哪些物品在销售，价格如何，什么地点等？不需要亲自去各个商店，也不需要打很多电话，屏幕上可以显示大量的信息。

卖方也认识到了这个变化，它们不但利用网络来传播信息和操纵消费者，还把寻找合适产品的更多任务转嫁给客户。这部分是出于财务上的考虑，也是诚实的商业手段，例如，买方通过网络订货的话，卖方可以提供更好的价格优惠。但除了这种正确的节省成本的策略外，经常也有不诚实的动机：卖方法图

把所有的信息搜集成本都转移给买方。例如，有些厂商让客户很难通过传统的渠道做生意，这对于那些不善于使用电脑和网络的人来说尤其麻烦。

在现代社会中，所有这些都会改变第6章第3节中曾讨论的买方和卖方的相对力量对比和负担分配（客户掌握主导权还是被操纵）。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导向改革以及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轨

目前有大量的研究文献描述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市场导向改革，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中国的案例。后来的书籍和文章则关注了苏东地区的国家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转轨。我这里是从一个主观角来看待世界历史的这个改变：市场的状态所发生的变化。

让我们从1949年开始，南斯拉夫那时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传统形态的短缺经济统治着从民主德国到中国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少数国家（以南斯拉夫为首，然后是匈牙利）开始偏离完全由中央控制、导致持续短缺经济的体制，于是在短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出现了过剩经济的孤岛。^①例如，1970年去布达佩斯市中心的食品商场，商品的丰富多样会令人感到窒息，但同时，这个城市的人们却要为电话、汽车和住房排队等候数年之久。

1989~1990年的政治剧变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强烈变革，改革的次序和速度在各国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对国有企业迅速实行了私有化，有的则是缓慢推进。过剩现象和短缺现象到处并存。某些地方快速和激进地实现了市场自由化，有些地方则拖延进行。两种现象的相对比例与所有制和调节机制的改革大致保持同步：过度需求与过度供给，短缺经济与过剩经济。

^① 我在前文曾用同样的比喻来说过剩经济中的短缺经济孤岛。

随着经济转轨接近尾声，过剩经济明显占据主导。这一历史变革从传统的斯大林式的短缺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过剩经济，或许是對本文所表达的思想的最生动的展现。^①为清晰起见，我附上了表11，重新分析了第2章讨论过的电话服务业的案例。表11显示，体制转轨前存在的电话短缺现象是多么严重，那也是短缺经济中最痛苦的案例之一。但在1989~1990年之后，短缺很快消失，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使用迅速普及。

表11 中东欧国家的电话排队情况（1971~2007年）

时间	保加利亚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1971~1975	n. a.	25.10	36.60	33.60	n. a.	n. a.
1976~1980	n. a.	30.20	47.20	45.70	n. a.	n. a.
1981~1985	n. a.	11.30	55.50	57.10	n. a.	n. a.
1986~1990	23.50	18.69	58.99	73.20	77.84	n. a.
1991~1995	20.36	25.49	41.72	51.20	98.38	8.82
1996~2000	11.09	7.19	2.89	10.39	56.75	3.77
2001~2005	3.21	0.77	0.51	3.75	23.13	0.44
2006	1.95	1.01	0.46	1.30	6.34	0.21
2007	0.20	0.81	0.52	n. a.	4.87	0.15

注：表中数据表示的是排队等候安装固定电话的人数与已有固定电话用户数的百分比。“捷克”一列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数据。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在“1986~1990”一排的数据是指1990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转轨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的数据来自：Kornai (1993, 第238页)。其他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2009) 和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6, 第104~112页)。

在为本文收集数据的时候，我必须遗憾地总结说，虽然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居民都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却没有多少时间序列数据足以表现出 来。对于发达国家经常发生的反复的周期波动，我们有上百个经济、商业和金融指数进行追踪。但对于经历了如此特殊的、不会重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轨的东方国家，却不得不说只有很少的统计调查和时间序列数据可用。^②

^① 后社会主义时期体制转轨的实证研究，可以参见文献综述：Djankov 和 Murell (2002)。那些最完整可靠的研究都得出了下面的结论：企业部门重组和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卖方竞争的加剧（第20~21页）。

^② 一个例外是达托格在匈牙利做的生产制约因素的调查（Kopini-Datong），这个时间序列始于转轨前的1987年，一直延续至今，没有中断或改变方法，可以进行跨时期比较。其调查结果的图示见图5，完整的数据见附表A.1。

这样的历史机遇将永不再有。

8. 后记

本文从讲述我的直观印象开始，最后又回到这里。

对短缺问题的研究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写于半个世纪前的1956年，那也是我的博士论文〔Kornai, 1994 (1959)〕。自此，短缺问题一直受到我的关注，也是后来的两本书的主题。我当时的看法迄今没有改变，并且一直看到，短缺经济有它的对立面。我希望自己在描述和解释这个现象时所用的分析工具在本文中已有所改进，可以更完整和更公平地评价两种市场状态的优点。但我还是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

我想，处于后社会主义转轨地区的很多人同样感受到了市场的这一变化。我知道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是用其他概念思考，他们看到市场的均衡，而我没有，我只看到市场状态幸运地从短缺经济跃迁到过剩经济。我喜欢借用的一个类比是埃舍尔（Escher）画的天鹅。从同一幅画中，有人看到从左向右飞翔的白天鹅，有人看到从右向左飞翔的黑天鹅。

另外—个与此有关的类比是我曾经在多马的论文中读到的内容。^①印度的一个故事说，国王让几位盲人去摸大象，讲述各自的感受。结果每个人都只摸到大象的一个部位，讲述的内容大相径庭。摸到象腿的人说是柱子，摸到象鼻的人说是又细又长的水管……大家彼此争吵，都自以为正确。

我已准备好迎接争吵，但在此之前还是得谦虚地说，我其实也是盲人。大象是如此宏伟，我只能探索到很小的一部分。

表A.1 制约匈牙利工业生产的因素 (1987~2010年)

季度	调查时间	需求不足		劳动力短缺		原材料、零部件供给不足		高素		不消	
		无	需	劳	力	来	原	产	财	不	确
		求	求	工	源	料	能	务	务	是	定
1987.1	1987年4月	13.0	26.0	22.2	41.2	42.6	7.2	31.2	0.0	42.8	
1987.2	1987年7月	10.3	27.4	23.7	42.3	46.7	6.7	24.3	28.5	42.9	
1987.3	1987年10月	11.2	21.3	24.1	46.6	50.4	8.2	22.1	22.0	42.1	
1987.4	1988年1月	17.0	24.1	15.8	39.4	41.8	4.6	20.4	20.4	45.8	
1988.1	1988年4月	10.7	28.0	15.7	50.0	50.0	32.8	6.3	32.7	24.8	45.3
1988.2	1988年7月	10.8	28.3	24.7	44.1	44.1	35.3	7.9	36.4	27.1	42.2
1988.3	1988年10月	11.8	27.3	23.0	45.3	45.3	64.0	8.6	35.0	31.2	47.6
1988.4	1989年1月	16.5	30.7	19.3	38.5	38.5	22.4	6.1	40.1	25.3	46.9
1989.1	1989年4月	10.8	38.0	21.5	37.6	37.6	17.9	4.7	49.6	23.9	46.6
1989.2	1989年7月	14.7	40.1	22.0	28.7	28.7	11.8	7.1	46.1	22.0	41.5
1989.3	1989年10月	12.7	40.4	21.9	27.5	27.5	8.9	5.2	46.8	24.6	42.6
1989.4	1990年1月	13.6	51.2	13.4	21.4	21.4	6.3	0.7	49.4	21.2	54.6
1990.1	1990年4月	10.8	51.3	12.1	13.8	13.8	3.9	3.6	57.8	16.4	50.9
1990.2	1990年7月	8.7	56.1	13.9	13.0	2.2	3.3	45.2	1.6	47.3	
1990.3	1990年10月	6.9	51.0	10.3	15.3	5.2	2.5	51.9	17.2	54.1	
1990.4	1991年1月	8.9	54.5	4.3	11.3	3.7	2.7	48.7	20.4	54.7	
1991.1	1991年4月	6.0	60.6	4.3	9.4	9.4	2.6	3.4	53.2	12.6	47.9
1991.2	1991年7月	5.5	70.1	4.0	7.1	7.1	2.4	1.3	54.1	9.9	43.0
1991.3	1991年10月	7.0	66.8	3.3	6.2	6.2	2.0	1.8	52.7	13.5	40.4
1991.4	1992年1月	0.0	65.9	3.0	7.2	7.2	1.0	2.7	47.3	13.7	42.3
1992.1	1992年4月	7.0	65.1	3.3	5.8	5.8	1.0	2.3	51.0	15.1	47.2
1992.2	1992年7月	6.9	62.2	7.4	5.9	5.9	1.5	3.7	45.9	15.0	43.0
1992.3	1992年10月	6.8	56.1	4.4	10.5	10.6	3.1	2.8	47.8	18.2	51.3
1992.4	1993年1月	9.2	54.5	4.8	8.7	8.7	2.3	3.3	42.9	15.6	45.9
1993.1	1993年4月	7.4	57.7	2.2	6.1	1.3	2.4	45.5	13.9	40.4	
1993.2	1993年7月	6.4	68.8	3.0	8.0	3.2	3.2	47.3	11.0	44.0	
1993.3	1993年10月	9.6	67.9	3.7	7.5	3.1	4.5	46.6	10.6	42.4	

附录

① 多马的论文题目就是《盲人与大象：对“主义”的评论》(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ts, As Essay on Isms, 1989)。他谈到，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是著名的印度裔美国籍苏联问题专家帕德马·德塞(Padma Desai)。

续表

季度	调查时间	高素 原材料、零部件供给不足				不消 不确			
		无制 约	需求不 足	劳动 动力	短缺	产能 不足	财务 问题	定的 经济	差的 经济
1993.4	1994年1月	10.9	62.5	4.3	9.4	2.4	4.6	47.3	14.4 46.6
1994.1	1994年4月	11.4	59.0	4.3	9.5	2.4	4.5	44.7	11.9 38.5
1994.2	1994年7月	11.7	59.5	6.7	7.1	2.9	6.5	42.4	10.7 39.8
1994.3	1994年10月	12.7	58.2	6.5	11.1	3.0	7.6	44.4	11.3 41.2
1994.4	1995年1月	13.2	55.0	7.8	10.1	2.2	5.4	40.0	14.6 40.9
1995.1	1995年4月	9.8	55.0	4.3	13.5	2.6	6.9	44.8	17.0 45.0
1995.2	1995年7月	8.1	60.2	7.4	10.2	5.1	7.1	42.4	16.8 43.1
1995.3	1995年10月	9.8	54.2	8.5	12.9	2.8	4.6	45.0	16.2 45.2
1995.4	1996年1月	11.1	56.2	4.1	9.4	2.6	6.1	41.0	18.7 45.8
1996.1	1996年4月	9.9	65.3	5.1	14.4	8.0	4.8	4.1	37.3 13.6 34.6
1996.2	1996年7月	11.5	65.7	4.6	12.1	5.5	3.2	4.6	36.9 11.8 32.6
1996.3	1996年10月	12.1	58.0	6.0	17.0	7.4	4.8	5.5	30.8 14.0 36.0
1996.4	1997年1月	10.9	61.6	3.6	14.9	7.1	2.1	5.0	30.1 17.1 33.6
1997.1	1997年4月	14.0	61.0	3.7	13.5	7.9	2.8	4.5	30.1 16.0 34.0
1997.2	1997年7月	15.2	63.0	4.4	15.0	5.3	1.5	4.1	27.9 16.1 30.2
1997.3	1997年10月	19.0	56.1	6.6	18.2	7.1	2.1	7.9	24.6 11.4 26.0
1997.4	1998年1月	25.4	53.3	5.5	21.1	8.1	2.3	6.9	23.7 13.0 21.4
1998.1	1998年4月	21.3	49.5	5.2	20.3	8.0	0.3	7.0	22.4 11.5 17.5
1998.2	1998年7月	22.5	58.9	5.1	16.1	4.0	1.4	6.5	22.3 11.5 20.3
1998.3	1998年10月	18.0	57.4	8.9	19.5	3.6	1.9	5.3	22.8 10.6 25.1
1998.4	1999年1月	24.0	58.4	7.0	19.8	3.3	1.2	6.4	21.6 9.7 22.5
1999.1	1999年4月	15.7	70.6	4.9	13.0	4.5	0.7	3.8	23.8 10.5 25.5
1999.2	1999年7月	13.2	71.4	5.0	11.0	3.8	0.6	3.5	23.3 11.0 31.1
1999.3	1999年10月	16.0	65.7	6.3	14.8	5.2	1.8	5.5	23.6 7.4 24.0
1999.4	2000年1月	18.0	60.6	4.4	18.6	3.5	2.0	4.7	24.6 9.8 25.2
2000.1	2000年4月	18.4	63.1	6.1	15.2	3.7	2.0	5.3	22.1 8.6 26.6
2000.2	2000年7月	16.9	55.1	7.4	18.9	6.8	3.4	10.1	25.0 12.2 21.6
2000.3	2000年10月	14.8	49.6	9.4	22.2	8.6	3.0	10.2	25.2 10.9 22.6
2000.4	2001年1月	23.0	53.6	7.9	23.0	7.1	4.4	8.7	23.0 13.9 23.4
2001.1	2001年4月	17.0	55.8	6.2	19.0	3.5	1.9	8.1	29.8 11.6 32.2

续表

季度	调查时间	高素 原材料、零部件供给不足				不消 不确			
		无制 约	需求不 足	劳动 动力	短缺	产能 不足	财务 问题	定的 经济	差的 经济
2001.2	2001年7月	12.1	61.7	6.6	19.1	3.9	2.3	5.5	26.6 13.7 31.6
2001.3	2001年10月	15.7	64.3	5.5	18.4	6.3	1.2	4.3	24.7 8.2 33.3
2001.4	2002年1月	14.8	67.0	3.5	15.7	2.6	1.7	2.2	23.0 10.4 30.4
2002.1	2002年4月	16.1	64.8	3.0	16.6	4.0	1.5	2.5	21.1 8.0 26.1
2002.2	2002年7月	14.3	67.9	6.3	16.0	3.8	2.5	5.1	23.6 3.4 27.0
2002.3	2002年10月	16.3	66.1	4.0	20.3	4.0	2.6	5.7	18.5 7.9 25.0
2002.4	2003年1月	12.2	68.3	3.6	14.5	3.6	1.8	3.6	14.5 9.0 29.9
2003.1	2003年4月	12.4	70.3	3.2	15.1	4.3	2.2	2.2	21.6 4.9 30.3
2003.2	2003年7月	8.7	66.9	4.9	12.5	4.2	1.0	7.0	24.0 11.5 37.6
2003.3	2003年10月	11.7	59.9	7.8	20.8	7.2	3.3	6.8	25.4 17.9 38.1
2003.4	2004年1月	9.3	64.0	5.4	17.8	5.0	3.9	4.7	23.6 15.9 43.8
2004.1	2004年4月	16.0	58.0	6.1	16.7	7.9	3.9	5.3	26.8 13.6 37.7
2004.2	2004年7月	14.0	54.0	7.1	19.9	11.2	6.2	8.3	25.7 11.6 34.4
2004.3	2004年10月	13.0	59.8	7.0	24.0	9.2	4.4	6.3	28.4 9.2 33.9
2004.4	2005年1月	9.1	59.6	7.7	19.7	7.2	4.3	5.3	26.4 15.4 34.6
2005.1	2005年4月	8.8	65.4	3.2	19.3	4.6	1.8	7.8	27.2 12.9 36.4
2005.2	2005年7月	8.5	69.7	3.8	23.7	6.6	2.4	5.7	25.6 18.0 37.0
2005.3	2005年10月	10.9	61.7	7.1	22.4	6.6	3.3	8.2	29.0 16.4 37.2
2005.4	2006年1月	10.3	60.9	3.3	26.6	4.3	3.8	7.6	28.3 14.7 33.7
2006.1	2006年4月	12.6	56.5	6.8	26.2	4.7	4.2	8.9	24.1 12.0 34.0
2006.2	2006年7月	11.7	53.2	8.3	30.2	4.9	5.9	8.3	19.0 21.5 46.3
2006.3	2006年10月	10.4	52.0	10.4	30.2	9.4	6.9	8.4	23.8 21.3 48.5
2006.4	2007年1月	9.6	47.8	10.1	30.3	8.4	5.1	9.0	25.3 19.7 44.9
2007.1	2007年4月	13.9	50.3	11.9	29.1	6.0	6.0	11.3	21.9 15.9 36.4
2007.2	2007年7月	7.3	47.6	9.8	32.7	7.8	3.9	8.3	32.7 26.3 53.2
2007.3	2007年10月	6.0	56.0	7.5	41.8	5.2	2.2	9.7	29.9 26.1 57.9
2007.4	2008年1月	8.5	56.8	9.0	36.2	8.5	2.5	7.5	28.1 30.2 48.2
2008.1	2008年4月	5.3	50.6	8.4	41.6	7.4	4.7	31.1	27.9 55.3
2008.2	2008年7月	10.3	49.7	10.8	38.5	5.1	4.6	9.2	27.7 27.2 54.4
2008.3	2008年10月	3.7	69.4	4.5	20.8	4.2	1.5	3.8	40.0 29.4 66.4

续表

季度	调查 时间	高薪 原材料...零部件供給不足									
		勞動 需求 不足 不足以 短缺	勞動 質勞	國內 產能	布區 財務	元區 不足	問題 經濟	經濟 經濟	管制 經濟	管制 環境	
2008. 4	2009 年 1 月	4.5	75.0	2.3	14.0	4.2	1.9	1.1	40.5	35.6	65.9
2009. 1	2009 年 4 月	3.9	78.6	0.9	12.7	4.3	2.2	2.2	39.7	62.4	
2009. 2	2009 年 7 月	4.7	76.3	1.4	13.0	4.7	1.4	1.9	39.1	30.7	58.6
2009. 3	2009 年 10 月	4.5	76.8	2.3	11.4	2.3	0.8	3.8	36.4	28.0	64.4
2009. 4	2010 年 1 月	8.0	79.1	1.0	13.9	2.0	0.9	2.5	37.3	30.4	58.9
2010. 1	2010 年 4 月	5.4	78.4	2.7	9.9	3.3	1.6	2.7	39.6	26.1	52.3

注：受访者接受的问题是，“您的企业的生产遇到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有几种答案可供选择，参见表格的表头。表中的数据显示的是答案所占的相对比例（全体受访者 = 100）。

资料来源：Direct communication by Kopiat - Tóthki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Market Research.)。前文的图 5 是本表的图示。

参考文献

- Aghion, Philippe – Howitt, Peter P. (1998):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Akerlof, George A. – Shiller, Robert J.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Allain, Olivier – Canry, Nicolas (2008): Growth, Capital Scrapping, and the Rate of Capacity Utilisation. Working Paper. 12th Conference of the Research Network,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lin.
- Antal László (1980): Fejősök körül. A magyar gazdasági mechanizmus a 70-es években. (Development with a Detour.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1970s.) Gazdaság, Vol. 14, No. 2, pp. 28–56.
- Arthur, William Brian (1994):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 Atas, Patrick (2009): China: The Vicious Circle of Excess Capacity. Natixis, Economic Research.
- Atkin, David J. – Lau, Tien-Yu – Lin, Carolyn A. (2006): Still on hol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ompeti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or its 10th Year
- Ball, Laurence – Mankiw, Gregory N. (1995): A Sticky – Price Manifesto. NBER Working Papers, 467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artelsman, Eric J. – Haltiwanger, John – Scarpetta, Stefano (2004): Microeconomic Evidence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in Industrial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Benassy, Jean-Pascal (1982): The Economics of Market Disequilibrium.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Bhaduri, Amit (200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Innovations.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 Bils, Mark – Klenow, Peter J. (2004): Some Evidence on the Importance of Sticky Pri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2, No. 5, pp. 947 – 985.
- Blanchard, Olivier – Gali, Jordi (2007): Real Wage Rigidities and the New Keynesian Model.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9, pp. 35 – 65.
- Blinder, Alan S. – Canetti, Elie R. – Lebow, David E. – Rudd, Jeremy B. (1998): Asking about Prices: A New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Price Stickines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 Brabant von, Jozef M. (1990): Socialist Economics: The Disequilibrium School and the Shortage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4, No. 2, pp. 157 – 175.
-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0): Job Openings and Labor Turnover Survey (JOLT). www.bls.gov/jlt/tdata (downloaded: 11.10.2010.)
- Chamberlin, Edward H. (1962) [1933]: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Chamill, Christopher (2010): US Government Spending http://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numbers#sgs302 (downloaded: 30.11.2010.)
- Chikán Attila (1984): A vállalati készletezési politika. (Inventory Policy of Enterprises.)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Budapest.
- Chopra, Sunil – Meindl, Peter (2003):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 Clavel, Laurent – Minodier, Christelle (2009): A Monthly Indicator of the French Business Climate. INSEE, Paris, http://www.insee.fr/fr/publications – et – services/docs...doc...travail/G2009 – 02.pdf (downloaded: 12.01.2011.)
- Clower, Robert W. (1965): The Keynesian Counter – 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Hahn, Frank H. – Brechling, P. R. (eds.): The Theory of Interest Rates. Macmillan, London, pp. 103 – 125.
- Clower, Robert W. (1967):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onetary Theor-

- ry.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6, No. 1, pp. 1 – 8.
- Corrado, Carol & Joe Mathey (1997): Capacity Uti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1): pp. 151 – 167.
- Corrado, Carol & Joe Mathey (1997): Capacity Uti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1): pp. 151 – 167.
- Couts, David A. 2010. Darwin's Views on Malthus. http://members.optusnet.com.au/expoentialist/Darwin_Malthus.htm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Cowan, Robin – Rizzo, Mario J. (1996): The Genetic – Causal Tradition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Kyklos, Vol. 49, No. 3, pp. 273 – 317.
- Crotty, James (2001):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urrent Capitalism: A Keynes – Marx – Schumpeter Analysis. http://people.umass.edu/crotty/india_rev-May25.pdf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Crotty, James (2002): Why There is Chronic Excess Capacity. Challenge, Vol. 45, No. 6, pp. 21 – 44.
- CS Ad Dataset (2007): US Internet (online) advertising expenditure in millions of U.S. dollars. <http://www.galibinlink.org/cs-ad-dataset.xls>,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Davis, Christopher – Charemza, Wojciech W. (eds.) (1989):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 Dentsu (2009): 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in Japan 1999 – 2009. <http://www.dentsu.com/marketing/index.html>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Diamond, Peter A. (1982):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in Search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0, No. 5, pp. 881 – 894.
- Djankov, Simeon – Murrell, Peter (2002):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Transition: A Quantitative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0, No. 3, pp. 759 – 792.
- Domar, Evsey D. (1969): The Blind Man and the Elephant: An Essay on Isms. In: Evsey Domar (ed.):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fi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29 – 46.
- Ekel – Rousse, Hélène – Minodier, Christelle (2009): Do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in Industry and Services Help in Forecasting GDP Growth? A Real – Time Analysis on French Data. INSEE, Paris, <http://insee.fr/fr/publications-et-services/docs-doc-travail/G2009-03.pdf> (downloaded: 12. 01. 2011.) .
- Eter, Richard – Graff, Michael – Müller, Jürg (2008): Is 'Normal' Capacity Utilisation Constant Over Time? Analyses with Micro and Macro Data from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ETH Zurich, KOF Swiss Economic Institute, Zürich, http://www.cesifo-group.de/portal/page/portal/IfoContent/N/event/Conferences/conf_2d/2008-11-20-Third-Workshop-MacroeconomicsandBusinessCycle/work-makro3-graff-nm.pdf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Federal Reserve (2009):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7/Current/default.htm>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2010):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GDPAPC?cid=106>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2010):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g17/current/table12.htm> (downloaded: 01. 12. 2010.) .
- Flaschel, Peter (2009): The Macrodynamics of Capitalism: Elements for a Synthesis of Marx, Keynes and Schumpeter. Springer, Heidelberg.
- Frances, David – Kremer, Mirko – Münner, Stefan – Fries, Markus (2009): Strategic process flexibility under lifecycle dem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 121, No. 2, pp. 427 – 440.
- Freedom House (2010):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0 Survey. www.freedomhouse.org (downloaded: 03. 12. 2010.) .
- Friedman, Milton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8, No. 1, pp. 1 – 17.
- Galbraith, John K. (1952):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Galbraith, John K. (1958): The Affluent Society.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 Grover, Varun – Lebeau, Jon (1996): U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Transition.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Vol. 13, No. 4, pp. 213 – 231.
- Haugh, David – Mourougane, Amabelle – Chatal, Olivier (2010):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nd Beyond the Crisi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745.
- Hayek, Friedrich (1948): The Meaning of Competition. In: Hayek, Friedrich (ed.):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pp. 92 – 106.
- Heilbrunner, Robert L. (1986):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Marx, Keynes and Schumpeter. In: Heilbrunner, Suzanne W. – Branthall, David F. (eds.): Marx, Schumpeter, Keynes. ME Sharpe, Armonk, NY, pp. 13 – 25.
- Heilbrunner, Suzanne W. – Branthall, David F. (eds.). (1986): Marx, Schumpeter, Keynes & A Centenary Celebration of Dissent. ME Sharpe, Armonk, NY.
- Helpman, Elhanan – Krugman, Paul R.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Hodgson, Geoffrey M. (1993):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Bringing Life Back Into Economics. Polity Press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MI – Cambridge, UK. <http://>

ILO (2010):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r Market. EAPEC Databas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Genf.

IMF (2010):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statistics.org/imf/, (downloaded: 03.12.2010.)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6): World Telecommunication/ICT Development Report: Measuring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enf, pp 104 – 112.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7): Telecommunication Indicators. Telephones, Cellular Phones, and Computers by Country: 2006.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categories/international_statistics/telecommunications_computers.html (downloaded: 03.12.2010.)

Jones, Lamar B. (1989): Schumpeter versus Darwin: In re Malthu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6, No. 2, pp 410 – 422.

Kahneman, Daniel – Tversky, Amos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pp. 263 – 291.

Kahneman, Daniel – Tversky, Amos (1991):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 – Dependent Mode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4, pp. 1039 – 1061.

Kaldor, Nicholas (1972): 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Vol. 82, No. 328, pp. 1237 – 1255.

Kaldor, Nicholas (1981): The Rol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echnical Progress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 Economic Appliquee, Vol. 34, No. 6, 593 – 617. o.

Kapitány Zsuzsa (2010): Számítások a szocialista gazdaságok 1989 előtti autóhiányáról (Calculations on car shortage in Eastern Europe before 1989.) Manuscript.

Keynes, John M. (1967)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cmillan, London.

King, John L. – West, Joel (2002): Ma Bell's Orphan: US Cellular Telephony, 1947 – 1996.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Vol. 26, No. 3 – 4, pp. 189 – 203.

Kirman, Alan (1992): Whom or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6, No. 2, pp. 117 – 136.

Kirzner, Israel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Kirzner, Israel M. (1985): 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p. 119 – 149.

Kornai János (1994) [1959]: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Kornai János (1971): Anti-Equilibrium. North-Holland, Amsterdam.

Kornai János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North – Holland, Amsterdam.

Kornai János (1982): Growth, Shortage and Efficiency. Basil Blackwell and Berkeley, Oxford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Kornai János (2006): By Force of Thought. 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and The MIT Press, London Kornai János (2008):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Budapest.

Kornai János (2009): Marx through the eyes of an East European intellectual. Social Research, Vol. 76, No. 3, pp. 965 – 986.

Kornai János (2010a): Innovation and Dynamism: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Technical Progres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8, No. 4, pp. 629 – 670.

Kornai János (2010b): Hónárgazdaság – Táblagazdaság. (Shortage Economy – Surplus Economy.) Kiegészítő Szemle, Vol. 57, No. 11 – 12, pp. 925 – 957, 1021 – 1044.

Kornai János – Eggleston, Karen (2001): Welfare, Choice and Solidarity in Transition: Reforming the Health Sector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Kornai János – Márton Béla (1971): Gazdasági rendszerek vegetatív működése. (Autonomous Control of Economic Systems.) Sigma Vol. 4, No. 1 – 2, pp. 35 – 50.

Kornai János – Márton Béla (eds.) (1981): Non-Price Control. North-Holland, Amsterdam.

Kornai János – Maskin, Eric – Roland, Gérard (2003):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1, No. 4, pp. 1095 – 1136.

Kornai János – Rose – Ackerman, Susan (eds.) (2004): Building a Trustworthy State in Post – Socialist Trans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Kornai János – Rothstein, Bo – Rose – Ackerman, Susan (eds.) (2004):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 – Socialist Trans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KPMG (2009): Momentum: KPMG's Global Auto Executive Survey 2009. http://www.kpmg.com/Global/en/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Momentum/Documents/Momentum – AutoExec – 2009.pdf (downloaded: 17.12.2010.)

KSH (Középüti Statisztikai Hivatal,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2010): Data o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http://portal.ksh.hu/portal/page?_pageid=38, 59980&_dad=portal&_schema=PORTAL (downloaded: 12.11.2010.)

Lachmann, Ludwig M. (1976): From Mises to Shackle: An Essay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Laic Socie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4, No. 1, pp. 54 – 62.

Latvijas Statistika (2010): Population and Social Process Indicators. http://www.esb.gov.lv/node/30604 (downloaded: 14.12.2010.)

Lavoie, Don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

- bridge.
- Layard, Richard – Nickel, Stephen – Jackman, Richard (1991) : Unemploy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Lee, Frederic S. (1998) : Post Keynesian Pric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ijonhufvud, Axel (1968) :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Leijonhufvud, Axel (1973) : Effective Demand Failure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y, Vol. 75, No. 1, pp. 27 – 48.
- Leijonhufvud, Axel (2009) : Out of the Corridor: Keynes and the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3, No. 4, pp. 741 – 757.
- Malinvaud, Edmond (1977) :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Reconsidered. Blackwell, Oxford.
- Mankiw, Gregory N. (1985) : Small Menu Costs and Large Business Cycles: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Monopol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0, No. 2, pp. 529 – 558.
- Mann, Thomas (1987) [1924] : Versuch über Tschechow. In: Meine Zeit – Essays 1945 – 1955. Frankfurt a. M. : S. D. Fischer.
- Marx, Karl (1978) [1967 – 94] : Capital. Volume 1. Penguin, London.
- McGraw, A. Peter – Larsen, Jeff T. – Kahneman, Daniel – Schkade, David (2010) : Comparing gains and los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pp. 1438 – 1445.
- Milgrom, Paul – Roberts, John (1992) :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Prentice Hall, NJ.
- Milward, Alan S. (1979) :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 – 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Molin, Norman – Stevens, John J. (2004) : Diverging Measures of Capacity Utilization: An Explanation. Working Paper. 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Washington, D. C. : pp. 3 – 4
- Nelson, Richard R. – Winter, Sidney G. (1982) :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Nilsson, Romy (2001) : Harmonization of Business and Consumer Tendency Surveys World – Wide. OECD, Paris.
- North, Douglass C. (1990) :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North, Douglass C. (1991) :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5, No. 1, pp. 97 – 112.
- OECD (2003) : Business Tendency Surveys. A Handbook. <http://www.oecd.org/dataoecd/29/6f/31837055.pdf> (downloaded: 12.12.2010.)
- OECD (2009) : Responding to the Economic Crisis: Foster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Renewal. OECD.
- OECD (2010) :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and Job Vacancie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EL_LAB_REG1 (downloaded: 14.12.2010).
-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0, Job vacancies – ONS Vacancy Survey. <http://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Product.asp?vlink=9390> (downloaded: 13.10.2010).
- Olson, Mancur (1963) : The Economics of Wartime Shorta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NC.
- Orsato, Renato J. – Wells, Peter (2006) : U – turn: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 15, No. 11/12, pp. 994 – 1006.
- Phelps, Edmund S. (1968) : Money – Wage Dynamics and Labor – Marke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6, No. 4/2, pp. 678 – 711.
- Phelps, Edmund S. – Archibald, George C. – Alchian, Armen A. (1970) :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orton, New York.
- Pissarides, Christopher A. (2000) :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Theory.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Portes, Richard – Quandt, Richard E. – Winter, David – Yeo, Stephen (1987) : Macroeconomic Planning and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Poland, 1955 – 1980. Econometrica, Vol. 55, No. 1, pp. 19 – 41.
- Portes, Richard – Winter, David (1980) : Disequilibrium Estimates for Consumption Goods Markets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7, No. 146, pp. 137 – 159.
- Prékopa András (1995) : Stochastic Programming. Kluwer, Budapest.
- Ramey, Valerie A. – West, Kenneth D. (1999) : Inventories. In: Taylor, John B. – Woodford, Michael (eds.),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1. k ? tel, Elsevier, Amsterdam, 863 – 923 o.
- Rehman, Arnold (2010) : Health Care: The Disquieting Tru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7, No. 14, pp. 45 – 48.
- Robinson, Joan V. (1969) [1933] :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cmillan, London.
- Samuelson, Paul A. (1980 [1948]) : Economics. McGraw – Hill, New York – London.
- Schumpeter, Joseph A. (1959) : Business Cycles. McGraw Hill, New York – London.
-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Schumpeter, Joseph A. (1968) [1912] :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Business Cyc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Schumpeter, Joseph A. (2010) [1942] :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